

## 重庆陶研文史 (季刊)

主 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顾 问：宋乃庆 徐仲林 贾培基  
杜积西 邝忠炽 徐宗梁  
李一林 孙丹年 邹尚智  
孙朝云 罗春秀

主 编：张和松

副主编：郭 华

编辑部主任：代建佗

编 委：张和松 郭 华 魏 蓉  
蔡春洪 江明华 党忠良  
邓玉洪 唐智松 于 波  
代建佗

编 辑：贾振婷

准印证：渝内字(01)-(062)号

电 话：023-68519132

传 真：023-68852884

邮 箱：cqyctyh@163.com

邮 编：400050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地 址：重庆市谢家湾正街92号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内

设计编排：重庆巨典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收录网站：维普资讯网  
www.cqvip.com

### 行知思想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陶行知 (1)
从今年的儿童节到明年的儿童节·····	陶行知 (3)
从学军想到工学军·····	陶行知 (5)
山海与萧场之实验·····	陶行知 (6)
连环的义务·····	陶行知 (7)
经费·····	陶行知 (8)

### 学陶师陶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对素质教育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和松 (9)
心中的世界:陶行知对王阳明、杜威思想的接纳与改造·····	刘训华 周洪宇 (16)
陶行知的赤子丹心家国情怀——写给父母亲的颂歌·····	拱保罗 拱辰晖 (24)
论陶行知的办学宗旨及启示·····	廖其发 (28)

### 流金岁月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 (连载之二)·····	孙朝云 (35)
我所知道的一位老同志的陶研情结·····	张炳岭 (50)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留下的革命故事·····	胡平原 (54)
周恩来过春节·····	李庆刚 (59)
难忘的岁月——悼隆侃·····	文履平 (62)

## 教育教学

---

- 问得花儿朵朵开·····戴建新（65）
- 初中语文密码教学法初探·····胡 川（67）
- 雾里看花，花非花——浅谈初中语文外国诗歌教学中的对话教学·····陶 宣（70）

## 育才风采

---

- 开学典礼 | 行知育才：青春正当时，一起向未来！·····重庆市育才中学校（72）
- 这个春天，快来看看小陶子的“梦田”里种下了什么？·····重庆市育才中学校（76）
- 热烈祝贺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连续两次获得民盟中央表彰！·····重庆市育才中学校（78）

#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文/陶行知

今天贵馆民众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行知能躬逢其盛，参与大典，心里觉到非常快活。刚才冯先生<sup>[1]</sup>及两位来宾，已说了许多我心里所要说的意思，现在行知再简单的说几句。

近来我对“民教”二个字有点感想。教育在从前甚至现在是被少数有钱人把它当做私有财产占住了，就如同占取金钱一样，非但把它占有，而且还要存在银行的铁柜里牢牢保护，不轻易传给别人。我以为“民众教育”的根本意义，就是教人把知识广散给人众，不是像占取金钱一样，把它封锁在少数人的脑袋里，把头弄得大大的。干民众教育，便是要把教育、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空气是不要钱买的，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教育也就不能以金钱做买卖，人人可以自由享受。把教育当作商品做买卖，只被少数有钱人霸占，使大多数人像坐牢一般受限在一个“愚者之群”的圈子里，这绝对不行，我们极力要否认。有了空气人才活，没有空气便活不成。空气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少。教育也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少。新鲜空气是有益于人的，教育也不能仅是些泥灰污浊气，给人以害生。所以把教育、知识化做新鲜空气，普遍的广及于大众，人人可以按其需要，自由呼吸，因而增加大众以新的生命活力，我以为这便是民众教育最主要的意义。不过挂着民众教育的招牌，不见得就会把知识变成空气，必得要有办法才行。在我看来，这

办法便只有运用小先生，小先生便能把知识变成空气。

小先生出世尚未到一年，而它的怀胎，却远在十数年以前。小先生最重要的几位接生婆，除我以外，你们的主任冯先生也是一个，今春“一二八”宝山普及教育动员令，便是冯先生发的（《生活教育》第一期画报，很希望大家一看）。每村小先生发令旗一面，普及教育，把知识变做空气！

小先生为什么能把知识变成空气一样的容易普遍呢？因为小先生便是小学生，他早上学了两个字，晚上便可以把这两个字拿去教人，此刻学了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彼时即可以把这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去教别人，他不像大先生一样要领薪水。所以我们可以不化经费把教育普及出去。

有人说，小先生要有相当程度才行。我敢保证说，六岁小孩便可以做小先生，这是有着铁打的事实。当然，小先生所遇到的困难非常多，我现在正要写小先生的八十一难。《西游记》上唐僧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道难关，幸而有三个徒弟费了很大的力量把它一个个的解除了。有的是猪八戒帮助解除的，有的是沙僧帮助解除的，而帮助唐僧解难关最多的要算孙悟空。现在小先生普及教育，正犹如唐僧向西天去取佛经一样，要经过八十一道难关。我们做个猪八戒也好，做个沙僧也好，做孙悟空更好，总动员去帮助小先生解除一难又一难，把教育变成新鲜空气普及出去，以增加大众的新兴力量。

用小先生普及教育，还有四点比大先生好的

地方：

第一，中国最难普及的是女子教育。乡下十七八岁大姑娘，或是二十几岁的大嫂子，一位年青的男先生去教，乡下人是看不惯，不欢迎你去教的。即有较开通，肯受教了，不多时，谣言来了，女学生不敢上学了，甚至把学堂封掉了，男先生失败了。女先生去教固然是很好，可是女先生太少了，而且女先生大都是些少奶奶、小姐，肯下乡的真是难得。有勇气下乡的，怕蛇，怕鬼，怕小偷，又吓跑了。如果是男校长请女教员，那又有困难问题。夫妻学校最好，可是又太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现在小先生来了，女子教育就如雪团见太阳，一见冰消，问题一笔解决。广东百侯中学有三百小先生，教二千多民众，其中女人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由此可见小先生对普及女子教育问题解决之一斑。

第二，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衰老了。我推究其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便是被人教老了。六岁小孩子，大人就教他要“少年老成”，而这小孩子也就无形中涂上两个八字胡须，做个小老夫子了。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到一个女子中学去当教员，可是年纪太轻了，很不为人敬重。后来教员不当，找了一件别的事做，便养起一嘴胡子来。本来是个美少年，一变而为美髯公，因此很受人敬重而做了许多年的事。所以中华民族衰老，便是社会教人变老，教小孩子做小老翁。用小先生教人便不同了，大人跟小孩学，无形中得一种少年精神，个个变为老少年。本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样一来，朝气必格外勃勃。前天在上海西区小学开小先生会，有一位小先生教一个八十三岁老太婆。又有一位孩子，教其德国母亲认中国字，写的故事均非常生动有趣。南京有一个丁广生小先生，教他父亲。他父亲有一天用笔画一个乌龟，画一角菱角。小先生不懂，问他父亲什么缘故。他父亲告诉他说：“我画着玩的，这意思是说：菱角怕乌龟，乌龟爱菱角。”后来丁广生便把这几个字写出来教他，父亲读得非常有趣。前天下午两点半钟，我未吃午饭，正想出去买两块烧饼充饥时，忽接西桥小先生来的信，我便坐在门外

一个竹椅上拆开来看。有一位小先生教他六十二岁的祖母。他的祖母能读能认，不能写字，小先生便代祖母口里说的意思写信给我，精神非常好，我看得饭也忘记吃了。在这许多故事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可以因小先生而转老还童，而得一种新兴的少年精神。

第三，刚才我已说过，过去甚至现在，教育是被少数有钱人把它当为私有财产占住。小先生一出来，“即知即传人”，立刻把这种观念撕得粉碎，要知识公有，不再私占。要把教育化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一样，人人有得到沾施的机会。“天下为公”的基础，第一步便要知识公有。这一点，小先生是可以帮助我们，一个钱也不要化的做到。

第四，一般多村小学要和学生家庭联络，很多困难，教师感觉孤立，学校感觉单调，利用小先生那便好了。小先生是一根根流动的电线，这一根根电线四方八面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幅生活教育网、文化网，把学校与家庭构成一体，彼此可以来往，可以交通，它把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带回学校，再把学校里的知识技能带回社会去。这样一来，如有一位教师，三十位小学生，而这三十位小学生便是三十位小同志，教师不再孤立，学校也不再和社会隔膜，而能真实地通出教育的电流，碰出教育的火花，发出教育的力量。训练班诸位同学，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怎样把小先生的办法得到？”“怎样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将来到一处办民众教育馆，最要紧的，便是要和当地的小学校联络，私塾联络，店铺里的能看报的掌柜联络，要发动他们都负起教人责任，即知即传人，共同普及教育。还有一点，办民众夜校，开学后学生只见少而不见多。我们也得要教学生去做先生教人。譬如有四十位学生，我们教他们每人回去教二个人，这样便一共有一百二十位学生了。这样成人做先生，我们不叫他“小先生”，叫他做“连环先生”或“传递先生”。因为他是要继续不断地循环着，学后去教人。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向诸位贡献。

我们现在办民众教育必得要承认：

# 从今年的儿童节到明年的儿童节

文/陶行知

今年的儿童节<sup>[1]</sup>是在微风细雨中过去了。这微风细雨确是象征着现在中国的儿童运动。传统儿童运动之柔弱与今年四月四日的天气是相映成趣，而新兴儿童运动之种子也正好在它所润泽的土壤中发生嫩芽。但不久，这嫩芽需要太阳光来暖化，那笼罩天空的阴沉沉的密云是必须让开。

这几天报纸上是充满了都市儿童的消息：纪念会，招待会，免费游览，减价买物，童子军检阅，送儿童玩具，给儿童糖果面包吃。这些是多多益善，谁都高兴。但中国儿童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动的机会！是自动的机会！是联合自动的机会！这“联合自动”是一件最可宝贵的礼物，应该用红纸包起来，送给每一个小孩子。我们今年如果把这礼物忘了，还得补送，从今天补送起，送到每一个儿童都得到这个礼物，才算尽了前辈的责任。这笔帐最迟是一年一结。我们

期待着明年儿童节的清算。

今年上海市儿童节纪念会中可喜的一件事是劳工儿童代表、五区卷烟业工会伊明望的演说。他要求提倡劳工儿童教育。他说，儿童节要打破成人轻视儿童之心理。这不是一个小孩子的私见，他所说的是全国的苦孩子所想说而没得机会说的公意。这是我们亏欠苦孩子的一笔大债，到明年儿童节是预备还掉多少，我们应当通盘计划一下子。

但是在同一会场上另一小朋友的演说，却使我们有些失望。他要小朋友实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礼是什么？朱子注解礼是天理之节文。天理又是什么？我是虚度了四十几岁，却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更不敢向大家宣传。因为我自己不懂的东西，拿来随嘴乱说，我不是变了一个喇叭吗？当时孔子提倡这种学问的时候，就拿不

农人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农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农人！

工人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工人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工人！

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工作便是：

帮助进步的农人格外进步，由他们“联合自动”，领导全体农人一同进步！

帮助进步的工人格外进步，由他们“联合自动”，领导全体工人一同进步！

帮助进步的小孩子格外进步，由他们“联合自动”，领导全体小孩子及时代落伍的成人一同进步！

## 【注释】

本篇是陶行知1934年在宝山县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民众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记录。记录者：张新夫、朱学典。原载1934年12月1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20期。

[1]冯先生 即冯国华。

出证据来。他曾经说过：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连孔子自己都拿不出证据来，何能取信于人呢？若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不是古礼而是今礼，那么，今礼是哪几条？您若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便知道“礼”这个字在现在是几乎等于代数学上的“X”——是一个未知数。礼既是一个X，小孩子便无所适从。弄到后来，非礼勿视会变成一个光棍的“勿视”，非礼勿动会变成一个光棍的“勿动”。勿视与勿动只是大人的乱命。小孩不视便是瞎孩子。小孩不动便是死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民族自杀的口号。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的动！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明年的儿童节要看我们的成绩。

大人们异口同声的说：“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这句话是反映着一个传统的态度。表面上看去好象是一种期望，其实是一种变形的抹煞，抹煞了儿童的现在的资格。儿童是现在的小主人！明年的儿童节，我希望大家都承认这小主人

的封号，并且不阻挠儿童实行主人的职权。

这次新闻界是抹煞了乡村的儿童。除了《申报画报》有一张乡下小孩放风筝的图画外，简直找不着一点乡村消息。独有《时代》记者叶浅予先生冒雨下乡，采访乡下儿童节新闻。明年儿童节，我希望多有几位新闻记者能蹈着浅予先生的脚步到乡下来，打听乡村儿童的苦况，使他们的啼声能达到国人的耳鼓。

最后我有一点小希望要向大家陈述。“小先生”“儿童工学团”和“劳工幼儿团”<sup>[2]</sup>都是今年儿童节的新礼物。我希望：这些种子能遍撒人间，会和明年的黄金色的菜花一齐开放，开得一样的茂盛。到那时，儿童们当是多么的欢喜啊！

#### 【注释】

原载1934年4月16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5期。

[1]儿童节 那时南京国民政府定每年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

[2]劳工幼儿团 设在沪西女工集中的地区劳勃生路。是陶行知指导创办的一所实验性的工厂区的幼儿园，由孙铭勋、戴自俺经办。其主旨是为劳工服务，专收工人子女。它具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性质。这是陶行知实验幼儿工学团的一个园地。

# 从学军想到工学军

文/陶行知

邹平县的小先生组织学军的消息传来了。这是多么可贺的一件大事啊！周文山君新从邹平来，对我说：“邹平已经开始组织学军。每位小先生找到四位不能进学校的小孩做他的学生，便成立一学排。这位小先生就被任为学排长。故一学排是五个人。五学排为一学连，是二五人。五学连为一学营，是一二五人。五学营为一学团，是六二五人。五学团为一学师，是三一二五人。五学师为一学军，是一五六二五人。全县拟组织两学军，梁漱溟先生为第一学军长，杨效春<sup>[1]</sup>先生为第二学军长。这个办法预备先在县城试验，俟试验有效，再向乡村推行。”这是周君的口头报告，细节方面也许有遗漏或错误，但就我记忆所及，大体就是如此。这是普及教育的急先锋。学军下之小先生是成了学兵，必可以一当十的向前进攻。信仰武装起来，自能冲锋陷敌，百战百胜，这是可以预祝的了。

邹平的办法已经是切实得很，但我希望大家还要作进一步的追求。我所要提出的几条修正的意见是：

（一）学军缺乏工的意义。没有工的意义，只能扫除文盲。扫除文盲不能算是一件小事，但在扫除文盲之外同时再干一点工，这是更有意思了。因此我提议把“学军”改为“工学军”。工学军便是工学团之联合体。为着任何危急的工作而需要广大的组织的时候，工学团得联合而成工学军。平时仍回到工学团的本位，少一些陆军色彩，多一些自由创造。

（二）从工学军长一直到工学排长都由小孩或民众担任，知识分子只做顾问或参谋。这样，才能培养自动的民众与小孩。

（三）小先生能力大的固然能够教四个人，但是能力小的只能教两个人。我以为大多数的小先生只能教二人。因此，我提议最下层的组织是三个人，称它为工学排。力能教四人的小先生连自己算在内是五个人，称为一个工学队。工学队的普及力恰是工学排的两倍。工学队的队长教四个人，工学排的排长教两个人，就普及的力量说，两排是等于一队。队与排不相统属。排之上级是连，队之上级也是连。于是十排为连，五队为连，三队四排也为连。……从总人数一方面说是不整齐，因为五队是二十五人为一连，十排就是三十人为一连。但是普及力是整齐的，五队是有二十个不能入校的学生，十排也是有二十个不能入校的学生。

（四）乡村组织仍当以工学团为基本组织。大村独立一团，小村可以数村联立一团。系统略示如下：

工学团——工学营——工学连——  
} 工学队  
} 工学排

在乡村中，每团的营数，每营的连数，等等，都应稍有变通，不可强同。

（五）小先生的学生不限定是小孩。社会里有许多成人是等候着小先生的教导。他的婆婆，他的妈妈，他的姊妹，他的嫂嫂，甚至于他的公

# 山海与萧场之实验

文/陶行知

山海与萧场工学团在所谓寒假期内，开始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普及教育的实验。构成山海工学团的分子是十四个村庄，构成萧场工学团的分子是十二个村庄。工学团是抱着“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的信条进行。以前山海与萧场对于本地团员之加入，只做到一个“来者不拒”；新近才开始做那“不能来者送上门去”的工作。我们将已经加入儿童工学团之团员变做小先生，分散在二十六个村庄里面，要成立二十六个儿童自动工学团，并各自推举团长。这些小先生每天除自修补，每人要教两个人。他们是拿着自己的书本教人。铅笔与抄写簿由新团员在消费合作社自购，无力自购者赠送。小先生的成绩，是凭着他们的学生即新团员所写的字考核。他们是负着把教育送上门去的责任，这责任他们是勇敢而慷

慨的尽了。他们已经把教育送到牧场，送到池塘，送到菜园，送到摇篮边，送到煤屑堆，送到祖母的膝前。每星期有指导员轮流到每个村庄指导两次，每月总集合一次，成绩以教会一个人读写一册书为一分，教会两个人读写一册书为两分，教会一个人读写两册书亦为两分，余可类推。每位小先生自开始之日起，即是参加教人比赛，为着打破狭义家庭主义起见，每逢教会家外一人读写四册书，可加一分。每团员均挂绿布团员证。小先生的团员证上加一金星。如果小先生的学生又教了人，他便是小先生的小先生，团员证上加两个金星。仿此，有三代学生的便加上三个金星，有四代学生的便加上四个金星，余可类推。此外各村还有团体比赛。每村团体比赛有八种标准：一、生产教育的普及标准；二、科学教

公，他的爸爸都不是平常民众学校所能招得来的。只有小先生能把教育送到他们面前。小先生不但是普及儿童教育的生力军，而且是普及成人教育的急先锋。在小先生的手里，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是打成了一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搓成了一团。

（六）普及教育是要城里与乡下同时并进。家常便饭的教育才值得普及。我们所要普及的既是家常便饭的教育，就不能叫乡下人等到城里人吃饱之后才去吃。我现在对于风行一时的试验是怀疑了。“试验”二字到了中国来是变成了延缓的口实。

我自得了邹平的学军的消息，是快乐得连觉也睡不着。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出来，请求邹平

和全国普及教育同志的指教。我深信用工学团，或工学团的联合体——工学军——来普及生活教育，不但是可以两年之内把文盲一扫而空，并且可以继续不断的把一个合理的社会创造起来。

## 【注释】

原载1934年5月1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6期，题为《从学军到工学军》。

[1]杨效春 曾任晓庄学校指导员，1929年初离晓庄。当时在山东邹平协助梁漱溟试验“乡农学校”。



# 连环的义务

文/陶行知

我们留学生出洋的钱哪里来的？大众纳的税。有的回国多年，荷包快满，该是我们还债的日子到了！这笔债该是怎样的还啊？还给大众！还给大众的孩子！该还债的联合起来，三个五个跑到一县去，找一二十个受过特殊教育的青年作艺友，不收束脩，只要他们一面求学，一面即负起教人的义务。于是这一县的工师养成所便可创立。这些艺友便是工师养成所之指导员。同样招

致本县有志青年一二百人做第二代的艺友散在各村，各收农人小孩数人做第三代的艺友，领导全村农人与小孩创立工学团，使生活教育之普及得以急成而永存。这样，大众尽义务教我，我尽义务教你，你又尽义务教他，教他的孩子，教他的孩子又教别人，就是我所说的连环的义务。这连环的义务其实是交相利。各人有此认识，则教育普及只要一举手之劳便能成功。

原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育的普及标准；三、自卫教育的普及标准；四、交通教育的普及标准；五、艺术教育的普及标准；六、康健教育的普及标准；七、共济教育之普及标准；八、文字教育之普及标准。八项之中以文字教育最易普及，今年年底二十六个村庄里面六岁以上的人民百分之九十要达到读写四册《老少通千字课》的标准，百分之九十五要达到

能签写自己姓名的标准。生产教育标准最难透达，预计大概要六年才能达到最低限度之标准。任何一村达到任何一种普及标准时，即得工学团联合会之普及旗。例如文字教育普及旗，今年年底即希望多数村庄可以领得，而宣告各该村文字教育之普及。他种教育普及程度当随时考核，一达普及标准即行授旗。

原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 经费

文/陶行知

已设的学校，改为工学团，如果以各地固有之校做根据，只须节省浪费已可发展。这种工学团要规定一条办法，即每人须拿自己的书在校外教两个人读写，并拿二人所写的回团报告，便可叫文字教育普及。这是不必费多少钱就能成功的。

没有学校的地方，最好是由工师养成所的艺友来干他一个填空运动，创立新的工学团来补充。每个工学团充分运用空房屋及固有家具，只需五十元到一百元的开办费便能设立。而这种经费与工师养成所的经费打成一片，实为举一而得二。谁出三百元一年，便能普及十六方里之教

育，即以此名誉鼓励之。

这是过渡的办法。永久之计还在生产上做工夫。例如宝山一县种棉二十万亩。我们提议组织二百个棉花工学团以策进全县植棉之改良，使种棉农人团结起来，自谋幸福而除痛苦。只须改撒种为条播，每年每亩收入已可增加三元，全县棉农遍用此法即可每年增加收入六十万元。倘若加以选种及合作出卖，每年全县增加一百多万收入并不甚难。预计六年内可以达到全县棉业整个的改进。那么，六年之后，只需棉花一项之增加收入，已足维持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了。

原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对素质教育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张和松

## 一、陶行知的教育目的与素质教育的一致性

### （一）强调教育目的的社会归属

陶行知曾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因此，陶行知所推行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等，都负有极强的时代使命。而我国的教育目的，从1958年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1999年的“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一不体现了我国新时期教育目的的特点，即不仅旨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要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进步。

### （二）强调要注重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儿童具有天然的、潜在的创造力，是人类世代延续的精华。但“发挥或阻碍，加强或削弱，培养或摧残这创造力的是环境”。因此，陶行知强调“教育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进而提出从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双眼、嘴、空间、时间来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并从“充分的营养”“良好习惯”和“因材施教”等方面给予培养儿童创造力的土壤。同样，本着“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素质教育，也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并以此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如此相同的教育追求，也证明了“创新精神”永恒的教

育意义。

### （三）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是陶行知教育目的的核心。在他看来，“真”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真假之真，即说真话，做真君子，求真学问；二是真知之真，真理之真，即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他一直把“追求真理做真人”看作是德育的首要任务，而且认为这一素质统领着人的其他素质。在现阶段，我国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规定中，把“德”放在首要位置，同样是看重以德为中心的素质教育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课程思想对新课程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课程回归社会，并在社会中提升，从而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课程内容总是来源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经筛选而成的课程教材又高于社会，最终又以提高人的素质作用于社会，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其效果的实现不但需要空间载体和形式多样，还需要与课程活动主体的需求相切合的出发点，而回归社会，特别是在“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本质观下，课程更应着眼于生活、着眼于社会，在生活中提升，在社会中提炼。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倡导课程生活化，并且要求回归到需求者和课程活动主体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社会中有活动主体的生活映

像，其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能做什么，能达到什么效果。从儿童的生活出发，以儿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课程才有持续的生长点；回归生活，回归社会，课程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课程改革就倡导课程回归生活。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统领下的课程体系，无不是以需求者的生活为中心，在生活中、为了生活、通过生活、学习生活，其课程活动的效果是明显的、有效的，因为其把握了学习者知识的生长点和拓展空间。生活和社会永远是课程更新的动力和源泉，不管是直接经验或是间接经验，其原生态都是生活。以往课程大都集中在远离生活的所谓理论状态，缺少回归生活的途径和中介，学生的发展也只能说是片面的。新课程的实施，就是要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经历找到生长点，并不断获得知识持续生长的动力。只要有人的空间，只要有人的生活，教育和课程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关键是我们的教育者要善于把握机遇和利用资源。教师应了解并熟悉学生的生活，并把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共学、共做，共生活。

（二）师生同在课程建构和实施中促进自身的发展

以生活和社会作为课程的范围，教师必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师必须广泛地学习、终身地学习，并且这种学习是要有胆识和气魄的，需要不断地创造和开拓。新的课程活动不是教书匠式的静态打磨过程，而是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实践和共同提高的过程。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不仅仅只有学生一个受益者，教师在不断地适应和创造中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现代的教师更应该是学习型的个人，并且是选择优秀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学习者。课程及课程活动，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

新课程改革需要新型的课程实施者。当前教师更多是知识的先知者和传授者，其依靠早已成习惯的程式化般执行课程计划，师生之间真正的平等、对话和互动、互促还没有实现。教师应该保持对学生强烈的爱心和专业上进的热情，把学生当作课程活动的伙伴和协作者，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成为与时俱进、有觉悟、会思考

的知识分子，引领学生成长。

（三）广泛开发与利用生活、社会课程资源，以补充课程活动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作为课程的基础伴随课程长期存在，且是一项被人重视和影响深远的工作，在课程活动中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使得课程有了古今中外的生活和社会以及实践作为基础。广阔的时空轴上的课程资源异常丰富，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其有着各种存在形态，可根据课程目标之需和课程活动之环境开发和利用大量显在及潜在的课程资源。陶行知可以说是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典范，其所处的年代决定其教育活动的展开只能自我创造条件 and 利用穷办法，广泛利用的条件性资源和内容性资源是当时普及民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的方法和影响在今天的课程改革中仍然值得借鉴，特别是在大量条件落后和现实条件缺乏的农村地区，利用当地的各种课程资源是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乡村课程资源呈现出地域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各乡村的地理分布、历史文化、经济特点以及相应的机构、设施及相关群体等，都因蕴含着诸多教育因素而成为潜在的课程资源，特别是乡村文化显著的独特性。目前大量乡村教育资源被忽视，同时已有资源开发不够。这不仅因为教育资源观念落后，而且实际开发中的问题也相当明显，如重视校内资源、轻视校外资源；重视硬件资源、轻视软件资源；重视条件性资源、轻视素材性资源；重视物的因素、轻视人的因素；重视形式，走过场，轻视挖掘资源的教育价值；等等。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对丰富的课程资源视而不见，甚至连已开发的资源也得不到充分有效利用；同时，盲目地重复开发，特别是超现实地凑条件、上设备，造成资源浪费。并且，社会参与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机制尚未建立，课程资源开发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薄弱。因此，因地制宜，合理地借鉴陶行知课程资源开发经验，对促进课程发

展特别是弥补乡村学校资源缺口、对深入推动新课程改革都具有重大意义。

课程开发能力是不是需要重新从头培养？很多教师认为目前自身课程开发能力不强，急需强化培训才能提高。从陶行知的实践看，这存在认识上的误差。教师作为课程活动者，当然具有课程开发能力，只是这种能力有高有低。培训是促进和提高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而不是从头开始培养。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更应在课程活动的展开中锻炼和提升，这就需要教师做有心人。只有教师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研究，才能培养多方面的解决课程问题的能力，这也是难得的课程开发能力。

当前课程改革的教师首先应确立科学的课程观，不断增强自身的课程意识，并从实际出发，在课程活动中逐渐培养相关能力，也就能逐渐成为课程的开发者，而不是被动的忠实执行者。

### 三、陶行知的德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一致性

陶行知极其重视年轻一代的道德和修养。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多次论述了他在品德教育上的独到见解。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他也为品德教育身体力行。因此，他的德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是我们实施德育教育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 （一）陶行知德育原则与素质教育的一致性

陶行知在德育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德育教育原则，为实现他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提供了保证。其德育教育原则主要有：

##### 1. 知情意合一

陶行知独具慧眼，提出了“知情意合一”的品德教育。他认为，“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陶行知进一步阐明了其思想观点和德育方法。首先，在行与知的关系上，先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

获，行动产生理论，理论指导行动。他重视学而知之，思而知之，但更重视行而知之。他主张在行动中获得真知，再以真知指导行动。这就是由行到知的转化，是知行统一的德育过程。其次，情感是促使知识转化为追求真理信念的催化剂，情感来源于认识，没有正确认识，情感只能是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陶行知所说的情感，表现为对于工农大众的真情。他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与大众打成一片，培养他们与工农大众的真实情感，“工学团”等学生组织即是明证。再次，“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奉行”，实指信念与行动的统一。信念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是理智、情感、意志的结合，能够反映人的精神面貌。知情意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伴随学生的心理实际进行疏导、释疑、“充电”、鼓劲。三者之间，知是追求真理的知识，情是追求真理的动力，意是有追求真理的坚定意志。知识是基础，情感是关键，意志是根本，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进而培养学生的文明礼貌。陶行知要求学生努力做到信念与行动的统一，即树立理想社会的信念，追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行动上则应有社会与大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最后，在追求真理的行动中，培养人的意志。将合理的意志之培养与正确的知识教育相联系，坚强的意志又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培养的。陶行知提倡的意志教育，不是培养只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意志，而是培养适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

##### 2. 教训合一

教训合一的方法就是陶行知在德育中提倡教师之间齐心协力，精诚合作。反对教训分家，即教书的只管课内传授知识，训育的专管课外训练品行。他强调：“知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教和训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和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

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知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他还强调“教训合一”的基础是“知情意合一”。他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可见，教、训、知、情、意诸要素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只有将诸要素完美地整合，才能达到完善学生品格之目的。

可见，在道德教育上，陶行知十分强调道德实践，并且在对学生的德育中，注重进行系统地、整体地教育。这和我们现在素质教育中，要求学生开展公民素质的全方位教育是不谋而合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 （二）陶行知德育教育内容与素质教育的一致性

德育教育内容是一定社会德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德育目标落在实处的最基本的东西。陶行知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留学后，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道德价值标准，对于中西道德教育之优劣，他一一进行了科学的剖析。因此，他的德育教育内容是中西道德、价值教育相互融合的产物。在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还应重视以下德育教育：

### 1. 私德培养

“私德为立身之本。”陶行知认为：“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碍公德的人。”公德是大德，是对国家和集体的态度和行为，私德则是个人的品德修养，一个人对个人都不严格，

是不可能对国家和集体认真的。他还主张要修养廉洁的个人，这样才能建立廉洁的政府和廉洁的社会。只有私德建立起来了，才能建立完整的“人格长城”，为国家和集体谋利益。他还说：“奋斗才是建设廉洁政府之康庄大道。我们要律己不苟，律下不苟，律上不苟，方能创造出一个人廉洁的社会。”如何培养学生的私德，他提倡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进行严格训练，既要有整体的长远目标又要有具体的措施。于是，他亲自制定了《育才中学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十二要》等规则，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守纪律、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讲团结的行为规范，以督促学生形成优良的私德。

素质教育就是要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使他们在步入社会后能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素质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主线，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爱国意识，学会负责、学会关心。关心应从身边做起，学会关心父母，关心同学，再推而广之关心集体，关心国家；负责也应从身边做起，对自己负责，对亲人负责，推而广之对集体负责。结合学生实际，更多地从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入手，培养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注重基本文明素养教育，使许多学生除了知道如何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如何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也要懂得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注重自身的形象，考虑公众感受。素质教育同样注重学生的民主与法制教育，以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点，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能力，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在普及法律常识的基础上，应注重法律的运用，法制精神的养成教育。

### 2. 人格教育

陶行知说：“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这实际上是要求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知、情、意”“真、善、美”等方面和谐发展，而素质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容的全面性，以全面发展个性为前提。素质，主要包括人格、知识和能力。在以上三种素质中，人格是第一位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深刻意

义，就在于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完善人格。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从陶行知的教育言论中，我们看出德育在其教育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德育思想和实践，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中国社会的特色。同样，在素质教育的诸多教育内容中，思想品德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德育正是担负着培养思想品德素质的重要任务，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因此，我们在选定德育内容时，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过于理想化、单纯化，而应结合社会现实和学生的道德状况，使德育内容鲜活、生动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发挥德育内容的最佳功效，提高德育的效果。

### （三）陶行知德育教育方法与素质教育的一致性

陶行知在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为了实现他的德育目标，通过不断的身体力行，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陶行知的德育方法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民主，他主张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第一，注重实践，在集体生活中培养；第二，德育重在自治；第三，师生共修。由此，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以培养“真善美”人格为目标，以爱国爱民爱集体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为核心，以“教学做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训合一”为原则。采用“注重实践，在集体生活中培养”“重在自治”“师生共修”等方法来健全学生的品格，以达到德育的目的。

## 四、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教学思想对当今素质教育教学的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主张，是针对传统教学的弊病，通过研究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很有启发，特别是对我们的素质教育教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一）教学目标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教学做合一”提出“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他特别强调教育要考虑时代、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当前的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以育人为根本，面向全体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技术、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等全面素质的教育。当今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要求人必须全面发展。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首先是当代科技综合化的趋势，要求探索、理解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全面发展。其次是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经济的人具备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合作竞争的精神。再次是发展整体化，强调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而且要以人为中心，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依靠人的发展。因此，以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 （二）教学要注重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结合

今天我们的素质教育仍然要求传授知识，但素质教育所讲的知识，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只是升学考试所必备的知识，它包括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两个方面。其次是知识的内化。素质教育强调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使之成为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仅仅是机械记忆而没有消化和利用的知识，不能称其为素质。

然而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量激增，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学校给学生的知识只能是最基础的一部分，因此，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从知识的传授过渡到对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培养，教会学生如何掌握知识，学会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这就叫作学会学习，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力。陶行知在培养学生学会学习、运用知识和如何做学问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我们的教学颇有启发。当前的教学方法改革，一方面应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养成自觉学习的好习惯；另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

使学生既能理解和掌握方法，又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对知识进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

### （三）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陶行如一贯重视学生“做事”本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他强调要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在“做”中产生思想、经验和新价值，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核心。具有适应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应付各种状况、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做事本领，是现代社会的青年一代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很多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遇到实际问题往往手足无措，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们的素质教育教学中，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尽可能地多动脑多动手去做、去参与，用所学的知识处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多联系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将社会焦点、热点问题放到课堂上，让学生进行分析、讨论。发现、发掘和强化学生的创造潜力，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也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贯穿在教学过程的始终。要建立平等、对话、互动的师生关系；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争辩，对老师、教材质疑；营造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动手操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列提出来，是很有道理的。没有实践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有创新精神的人。实践出真知，脱离社会实践来谈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只能是纸上谈兵。

### （四）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陶行知认为教学要重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让学生了解方法的形成过程，用同类的经验解决别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观察、思考和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也提出了要“引导学生质疑、调查和探究”，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问题设置是第一环节。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的问题应该是：基于学习者生活经历、学习经历提出的问题；所提示的问题有利于学习者将外部学习动力转换为内部学习动力；所提示的问题应具有一定的解题过程。这些问题和我们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又有着不同之处：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的问题应具有方向性，能指导学生向一定的方向进行研究和探索；二是应有系统性，每一个问题实际上表述的是解决该问题的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三是问题的阶段性，因为我们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把某一学科整个知识体系一次传授给学习者，所以我们所引出的问题就应有它的阶段性了。以问题为中心，给我们的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的教师有发现问题和组织学生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首要的就是要求教师扩充知识面，转换教师角色，从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的引导者。这也是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积极宣传和大力推进的工作重心之一。

此外，还要加强教师的师德建设和提高教师科研能力。

## 五、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及其对素质教育的现代价值

###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内涵

陶行知通过对不同时期创造教育的研究，赋予“创造”概念丰富的内涵，包括新思想、新观念。他认为“新观念的成立，是心理创造”。因此，我们认为，陶行知的“创造”和现今的“创新”一词是同义词。郑金洲教授认为，创新强调新颖性成分，而“新”总是相对而言的：相对本人来说前所未有的“新”，是“前创造”；相对所属群体他人未有的“新”，是“准创造”；相对全社会的独创是“真创造”。陶行知所使用的“创造”概念也包含了这三个层次。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内涵，大多学者认为：第一，创造具有普遍性。第二，死读书扼杀创造力。第三，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第四，从灌注的教授法里解放出来。第五，人人可以做研究工作。



第六，重视培养创造型人才素质。

##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 1. 汲取陶行知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树立创造的教育观

陶行知批判传统教育观，指出它的最大缺陷在于以传授知识作为教学的唯一目的，以培养能熟练掌握已有知识的书生型人才为教育目标，“把学生当天津鸭儿填”。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和以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体系，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个体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学生智力能力的培养，阻碍了学生别出心裁创造性的发挥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坚信每个学生都具有创造力，这是实施创造教育的前提。陶行知认为，创造具有普遍性，今天这一观点已被众多的研究者证实。我们当然并不否认“天才儿童”的存在，学校教育也要面对不同的儿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但学校教育更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教育，使每个学生在同等的教育环境下发展他们各自不同的创造潜能。创造具有普遍性，还说明了人终身具有创造力，并且创造具有多样性。

创造型的教育观应是把教材的讲授作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非最终目的。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儿童通过以教材为基础展开的学习活动，获得有关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并将抽象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在知识的运用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独创力。所以，创造型的教学是以教材为基础的一个开放系统，教学的目的是将教材的知识转变为儿童学习的经验，发展儿童的创新能力。

陶行知形容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视儿童为安静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对儿童来说，更多地意味着记忆和反复的练习以求熟练掌握某种既得的知识，而不是一个思考、浓缩和发现的过程。实际上，每个儿童都具有对未知事物进行主动探索和发现的愿望和能力，这也正是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基础所在。创造型的教学要求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就必须强调儿童的主动性，鼓励儿童对学习的主动参与，使儿童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培养发展各种能力，不断增

强创造力。

借鉴陶行知强调“做”和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形成，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首先，实践活动可以激发儿童广泛和强烈的好奇心。强烈的好奇心正是进行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其次，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可以提高儿童发现问题的敏锐程度，激发儿童的创造想象。再次，实践活动可以锻炼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儿童通过有创造性的实践，可以养成有利于创造力发挥的良好个性品质。

### 2. 借鉴陶行知“新教育要取得成功，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思想，大力培养创造型高素质的教师

创造，是陶行知的教师价值观，也是合格教师的评价标准。在陶行知的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陶行知对创造型教师的标准要求：第一，“教师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是改造乡村教育的灵魂”；第二，“要有好的学校，先有好的教师”，教师应该创造学校的灵魂；第三，“小书呆子”是由“大书呆子”教出来的，教师是创造型学生的培养者；第四，“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教育理论和创造技术”。我们今天主张培养“专家型的教师”，就是要使“教坛新秀”具备以上四个特点的要求。陶行知认为，新教育要取得成功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也就是要有“开辟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家，所以，培养富有创造力的儿童，必须要有创造型的教师。

原载《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心中的世界：陶行知对王阳明、杜威思想的接纳与改造

文/刘训华 周洪宇

陶行知作为近代中国教育领域极有建树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其思想受到古今中外思想家的熏陶。其中，对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起到重要思想助力的，主要是两位思想家，一位是明朝时期的心学大儒王阳明，另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哲学家杜威。学界对于陶行知思想演变的研究，大多从单个学者影响的角度进行比较，较少古今中外的综合性比较，从陶行知个体的心理角度来观察的文献不多。本文试从古今中外的立体维度，从陶行知的内心世界，寻找其对先贤思想的接纳与改造的历史过程。

## 一、个体的品质：陶行知对王、杜思想的时代性接纳

陶行知是一个内心卓越同时又有深刻想法并为之努力践行的人，这从他曾迷恋于阳明心学可窥一二。了解陶行知的个人品质，关注陶行知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地通过他的文章、别人与他接触后的回忆等方面材料建构。有趣的是，与陶行知同时代且具有一定地域文化、人文背景的人，如胡适，走了一条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道路，蒋梦麟、郭秉文走的是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的道路，陈鹤琴走了教育专业化道路，而陶行知走的是一条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道路。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这就要从他的内心世界，他对王、杜思想的接纳与改造说起。

陶行知出生于1891年，成长于几千年来中国

变革最为激烈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寻求国家发展出路的问题摆在了有思想的中国人面前。与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所不一致的是，陶行知选择了教育救国的方式。这种方式与陶行知对于王、杜二人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杜二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思想影响波及甚广，二是对时代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两点都可能对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王、杜二人思想的融合，是中国大转折时代的需要。仔细考察会发现，多灾难的中国，对于心学的理解、对于提倡实用主义以自强的追求，有着独特的时代适应性。家庭成长环境对于陶行知的思想接纳起到重要作用。在14岁之前，他的教育主要来自他的父亲和其他一些老师，同时1915年父亲的去世，也给他带来经济上的困难<sup>[1]</sup>。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而王阳明也是绍兴人（明清时期余姚隶属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的事迹对陶行知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行知的自身特质，对于其对王、杜思想的接纳与改造的作用至关重要。陶行知个性敏锐、思想性强，具有远大的社会理想和强烈的教育实践动机。他长期不息的兼济天下的情怀，正是他能够顺利接受王、杜思想并不断进行自我锻造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心学，相较于程朱理学，更强调个人奋斗和自我悟道，这契合年轻的陶行知的心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于前途迷茫的中国来说，自具现实意义。

如果说王阳明的心学对于陶行知来说是其思想成长的指导，那么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则是陶行知行动的指南。陶行知对于王、杜二人思想的接纳，还在于他们都具有行动的禀赋。

个人成长经历。在求学的过程中，陶行知读书的学校所在地，是受到阳明心学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杜威的《明日的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相继出版，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期。

“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sup>[2]</sup>他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始终警惕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陶行知对王阳明和杜威的接触，也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对于王阳明，他主要是受书本、环境和周围影响力的潜移默化与主动追寻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杜威，陶行知则有重要的师承关系，不仅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年求学过程中得到杜威的有效指点，杜威的一系列著作对陶行知产生影响，并且在1919年杜威来华访问期间，陶行知与他有零距离的接触和陪伴。这使得陶行知对于杜威的认识和对王阳明的认识处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上。如果说王阳明还是古人，多有神游追往的味道，那么对杜威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近距离观察。也正因为此，陶行知对王、杜二人思想的接纳显得自然，改造就更加适应形势需要。

还应该注意陶行知对王、杜思想接纳的态度是一种扬弃。比如说，相较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内心自在一说，陶行知是一种内在的继承，同时又突出强调了它的行动。陶行知在1934年曾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sup>[3]</sup>陶行知系统研究阳明心学是在其20岁时，而在其36岁时，则提出了与阳明先生相反的观点。

不同于对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接受，陶行知对杜威学说的态度，则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即在保留其价值合理性的同时，对他的这些体系进行了

一番改造。由于杜威与陶行知是师生关系，所以陶行知在活学活用方面，充分体现了杜威学说自然价值的一面。周洪宇用“继承中的超越与超越中的继承”<sup>[4]</sup>来形容陶行知基于中国国情对杜威理论的成功改造，费正清则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sup>[5]</sup>。陶行知在23岁时直接接触杜威，其后与杜威的直接交往一直到26岁。之后的往来则有书信，当然还包括1919年到1921年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在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4日在中国停留两年多时间，广泛发表演讲，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sup>[6]</sup>作为杜威在中国最为紧密的学生之一，陶行知先后联络胡适、郭秉文等人，对他的中国之行进行奔走联络，并请胡适与蔡元培、蒋梦麟等人磋商<sup>[7]</sup>，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陶行知对王、杜思想的接纳是个系统的过程，糅合了时代因素、个人禀赋、个人阅历等因素。

## 二、行动的立场：陶行知对王、杜实践性思想的顺向批判

陶行知是一个极有主见与执行力的人，尽管在学说上继承王、杜的某些观点，但绝不盲从，总能根据时代需要而有所改变。陶行知接受王阳明学说的路径是以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对于杜威的学说则是整体性、阶段性地接纳。阳明学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杜威学说则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教育潮流。1914年，陶行知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当他带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回国时，他是有着巨大的宏愿。然而很快他就发现现实情况与美国的差异，他不仅在细节方

面对引进的情节加以改变，而且在理论上完成了批判性的超越。

有想法才会有行动，考察陶行知的内心世界，是了解他对王、杜思想改造动力的重要抓手。陶行知心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教育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包括了各个层面的教育。比如对大学选址的思考，就体现了他个人阅历与中外教育因素的结合：“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广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sup>[8]</sup>这五段论，正是中国古典与西方传统相结合的思量，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陶行知的个人禀性。

在实践的立场上，陶行知与王阳明、杜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陶行知对王、杜思想的改造，是基于行动立场的顺向改造，是将两位的思想进一步贴近中国及中国教育的实践。陶行知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但后来还是对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进行了顺向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sup>[9]</sup>。陶行知知行理论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他将王阳明立足于儒家的唯心主义理念拓展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经验主义。

从横向比较来看，陶行知对王、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行动取向。陶行知思想有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即行动是它总的逻辑起点，这可从他的一系列论述中寻找端倪：“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惟有致知在格物一语。然格物之法何在，晦庵与阳明各持一说……类此者，皆坐格物不得其法之弊也。假使阳明更进一步，不责物之无可格，只责格之不得法，竟竟然以改良方法自任，则近世发明史中，吾国人何至迄今无所贡献？”<sup>[10]</sup>陶行知通过对王阳明格物致知及其方法论的理解，更倾向于以改革的方法创新实现路径的思维。陶行知从王阳明那里所悟到的，是做事视角，是事物的创新方法，这是对王阳明格物致知的自然接纳。

陶行知强调了一种试验的态度，以杜威的实用主义理念，来推动中国波澜不惊的教育局面。

“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sup>[11]</sup>而改造其时中国面貌的办法，就是发展乡村师范学校，尽快培养合适的师资。陶行知在谈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曾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生路。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采新的生路。”<sup>[12]</sup>因此，陶行知对乡村教育的生活主义态度，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的。

不应该忽视的是，陶行知对于王、杜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改造，并逐步形成具有陶氏风格的话语体系：“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知识……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sup>[13]</sup>陶行知在对于王阳明学说的态度上，使用了扬弃的办法。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sup>[14]</sup>可见，王阳明的心学里，本有知行合一的意味。从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出发，陶行知提出了唯物主义观点。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劳力上劳心”“即知即传”等主张，在反思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对王阳明知行学说进行了时代性的发展。

陶行知通过创办晓庄学校，实施教育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新教育，在农业立国的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改造意义。同时在晓庄学校实践过程中，他形成了“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等观点，完善了其学说理论。陶行知还通过积极推广平民教育，以实现其对于中国的教育理想。在给胡适夫人的信中，陶行知提出了通过连环教学法，将平民教育推广到家庭里去。利用家里已经

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只要家里有一个人识字，就可以教全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齐读书明理<sup>[15]</sup>。这表现了他对于推动平民教育，实现自我理想的信念。

陶行知通过教育改造，来完成他的教育使命。陶行知在1927年曾对王琳说：“我们现在要打倒的就是这八股教育、干禄教育。我们决定再不制造书呆子和官僚绅士们。你愿意舍身从事适合于农村生活的教育，我们是十二分的欢迎，我们可以共同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sup>[16]</sup>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内心对于教育改革的火热情。

### 三、生活的本源：从心学、实用主义向生活的有效回归

对生活性的追求，是陶行知构建教育理想世界和个人内在世界的主要归宿。王阳明的心学崇尚人的内在修为，于万事万物有着自己的内在的定力。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厘清儿童中心、学中做、学校即社会等问题上的推动作用，给了陶行知有力的行动臂膀，陶行知杜威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教育思想，并付诸行动。

在陶行知生活学说形成过程中，王阳明的思想起到了向导式的帮助。“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一起构成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sup>[17]</sup>陶行知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认为：“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末，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末，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末，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sup>[18]</sup>王阳明强调知前行后，陶行知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强调行前知后，突出了实践在人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

陶行知将王阳明的内心理学成功地引导至中

国当下的实践，也以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为喻，“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sup>[19]</sup>所以他认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杜威和陶行知的共性特征是都重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只是在倾向上体现不同，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但两者都是对以往教育的大超越。杜威用“教育即生活”观点批驳斯宾塞、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即美国现实教育，陶行知用“生活即教育”对中国教育的传统与现状大加鞭挞，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能够洞悉杜威生活教育的现实基础是陶行知对杜威学说继承发展的基础。陶行知在1930年曾说：“杜威先生在美国为什么要主张教育即生活呢？我最近见着他的著作，他从俄国回来，他的主张又变了，已经不是教育即生活了。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是零零碎碎的实验，有好多教育家想达到的目的不能达到，想实现的不能实现……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sup>[20]</sup>陶行知很能够理解老师学说的出发点和所思所虑，这使得他在进行中国教育实验时更能够强调中国化因素。

在进行乡村教育改造时，陶行知提出“活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sup>[21]</sup>。这个农夫的身手正是杜威的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情况。“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sup>[22]</sup>在其后的实践中，陶行知强调了动手能力及依靠工

具工作的倾向。陶行知强调教育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在创办第三中心小学时，陶行知曾说：“我们从野人生活里感觉到人的身体是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我们觉得人类要想征服天然势力，必须发明、制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sup>[23]</sup>

杜威对教育与生活关系，有这么一段定位：“我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我认为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sup>[24]</sup>而陶行知则将“教育即生活”结合中国国情，在晓庄学校及上海山海工学团上进行了有效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一种超越与创新。虽然两者在教育基点、教育指导原则、儿童发展观、教育行动研究思想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理论联系，但在教育本质观、教育领域观、教育方法观等方面存在着实质的区别<sup>[25]</sup>。陶行知的生活学说并没有脱离杜威的基础，只是在表述上从杜威突出“教育”转为倾向“生活”。可以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在改造王、杜二人思想上逐步形成的。

#### 四、奋斗的理想：从社会改良到社会改造的教育本土化

历史上，王阳明相继创立龙冈书院、稽山书院，主持贵阳书院等，创立王学，门人众多。陶行知创办有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和重庆育才学校，形式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实践环节，王阳明走精英教育，开宗立派；陶行知走平民教育，泽被苍生。王阳明也有教育改造的思想，但主要是基于方法层面，在社会层面的着力点并不明显。

杜威在教育实践中只是社会改良者，并不是改造者。陶行知教育实践观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社会改良：1930年代后对国民党政权逐步失望，逐步演变为社会改造。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说，陶行知超越了杜威的实践境界。陶行知早期的社会改良思想源于杜威，但中后期的社会改造思想则源于现实。同时，陶行知的老师、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罗格的社会改造思想，也对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陶行知一方面性格比较尖锐，对于不同意见能够较为直接地表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却能够很好地维持与他的老师们的友谊。克伯屈在日记里描述他的学生们时，称陶行知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对于蒋梦麟或者其他，则明显没有这样的表示<sup>[26]</sup>。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里面也含有克伯屈等人思想的身影，“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是世界上公认的，而根据这个理论找出具体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理念，予教育界一个伟大贡献的，就是克伯屈先生发明的设计法”<sup>[27]</sup>。很显然，在陶行知的一系列具体教育实践中，也有设计法的影子。

尽管陶行知在美国留学并深受杜威学说影响，但他并不痴迷于欧美教育，而是从内心里主张教育的中国化，有对现实教育的批判。“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格，却是很大的缺点……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sup>[28]</sup>在陶行知的内心世界里，教育中国化的最好体现就是平民教育。

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造，是陶行知达到理想世界的主要途径。他为此也进行了多次尝试。陶行知在诸多实践领域的勇敢尝试，使得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造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陶行知从美国回国后，“毅然转向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和特殊教育等领域大胆探索，先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和重庆育才学校，通过艰难而独特的本土办学实践，汲取和改造杜威教育学说，提出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杜威，实现了民族教育学的本土建构”<sup>[29]</sup>。陶行知所超越的，也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内在视野。

面对中国具体国情，他开出了平民教育的药方。“现在的中国是糟到极点了……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教育问题。直言之，就是平民教育问题。中国四万万，内中有三万万二千万不识字……要使这三万万二千万人都识字，就是我们八千万识

字的人的责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余实业、交通、财政、司法……都容易了。并且这个问题不十分难，若去做，是很容易达到的。兄弟编有《平民千字课》四册，每册二十四课……四册共一角二分钱。每日读一课，九十六日可以读完。”<sup>[30]</sup>陶行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实践。

从与杜威的交往上来说，陶行知对老师即尊敬又推崇。1944年杜威在给陶行知的信中提到，“我希望将来美国对中国会有更多的帮助，不但是在军事方面，而且是要站在民主社会与民主教育的立场上，给予中国所需要的帮助”<sup>[31]</sup>。陶行知则表态：“我现在正想站在教育的岗位上，推动全民教育，以帮助真正民主的实现。希望您常常指教。”<sup>[32]</sup>但在另一方面，陶行知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两国之间在教育领域的巨大差异。对美式教育的批判，是陶行知思想形成效力的重要基础。“为使中国之教育能‘中国化’，不徒为抄袭欧美教育之皮毛，则第一必使教育与实际生活打成一片，尤必使教育与政治不相分离。”<sup>[33]</sup>即使与老师的关系融洽，他也能够清晰地感到中国与欧美之间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表明了陶行知清晰的主体意识，并不如同时代的他的同学们那样，过多地依赖欧美路径。

陶行知对王、杜二人的思想改造，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多方面，但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领域。而陶行知研究教育的落脚点是学生。陶行知在吸纳王阳明、杜威学说的同时，更是受到时代洪流和中国国情的启发，他将这些学说和思想提炼总结后，形成了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符合民众需求的教育体现。所以这种扬弃是对人类教育思想的自我提升。

杜威以经验作为教育哲学的基础，认为人与环境“以某些方式起着相互作用的事物，乃是经验”<sup>[34]</sup>。陶行知则通过行动将人与环境进行直接对接，他在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方面的尝试即属于此。“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sup>[35]</sup>陶行知重视杜威的教育改造观点，将经验丰富到感性层面，“马路、弄

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所失掉的是鸟笼，而所得到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sup>[36]</sup>。杜威认为，儿童天生具有四类兴趣：交谈或交流方面的兴趣、探究的或发现的兴趣、制作或建造的兴趣和艺术表现的兴趣<sup>[37]</sup>。陶行知就在教学方法论上进行大胆变革，“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sup>[38]</sup>。

陶行知从教育人到教育家的历史转变，在理论上是通过王阳明、杜威思想的接纳和改造实现的。接纳是基础，陶行知的接触途径一是阅读经典，二是深入反思，而改造的要求则要深刻得多。陶行知对王、杜二人思想的改造，既有其自身价值观的因素，同时也与其自身的阅历、视野、眼界是分不开的。周洪宇曾将陶行知誉为20世纪的文化巨人<sup>[39]</sup>，也正是基于陶行知对先贤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历史地位的一种评定。陶行知善于通过媒体宣传推进生活教育学说。他在谈到《战时教育》方针时曾说：“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sup>[40]</sup>

陶行知对先贤思想的改造效果主要停留在他的行动上。陶行知的乡村建设思想、现代化之路、民族解放思想等，是其在民国时期新旧更迭与中西文化融汇激荡的环境中形成的实践活动，从其一生的本源来说，均具有重要的行动价值。当然，有些内容是超越了王、杜学说本身的，如陶行知的现代化思想、民主思想等。

## 五、内圣与外王：传承王、杜学说的教育家之路

在陶行知成长为教育家的时代因素分析中，章开沅、唐文权提出了“三重文化圈”说<sup>[41]</sup>：第一阶段，家乡文化，是植根于传统的文化，陶行知受徽学的潜移默化影响。第二阶段，进入金陵大学之后，陶行知逐渐形成了民主共和理念，这在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有所体现，并在该阶段研究和信从阳明心学。回到陶行知成为大

教育家的时代土壤，基于民国肇始、传统信仰崩塌，价值观混乱之际，陶行知在激进与改良的道路选择上趋向于后者。然而，由于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影响，“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部分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或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sup>[42]</sup>，王学传统在近代再次起到了思想引领作用。

在国外，王学在日本被中国人认为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力，美国的学界对之也很有好感。

“中国王学甚好，在美国亦有相似之哲学，杜威一派的实验主义，即注重实行之哲学，与王学知行合一之说相同。”<sup>[43]</sup>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老师亨克，在1911年主讲王阳明，并开始研究。陶行知对王阳明思想的接触和认识过程与亨克对王学的研究，“在时间（1911）和空间（金陵大学）是重叠的，陶行知在1916年自述中说亨克是使他信奉基督教的老师之一，相信与他们的共同兴趣——王阳明——不无关系。而且亨克很可能是从一个基督教的诠释角度，以王学作为向金陵大学学生介绍基督教信仰的媒体”<sup>[44]</sup>。从这里可以推断出，陶行知对王学的接受，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有出口转内销的思想的影响，但这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第三阶段是赴美求学，不仅对陶行知的教育，更是从政治上展现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世界，从教育上展现了教育革新运动的新世界，从哲学上展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世界<sup>[45]</sup>。

当然，借助阳明心学的内圣和杜威学说的外王，都有一定的变化义和引申义。正如章开沅和唐文权所述，陶行知迎受并宣扬王学，是因为他深信王学具有利世的功效，但更重要的，“主要还是为了自身道德修持所需”<sup>[46]</sup>。这尤为突出，与他后来又向基督教靠拢（博爱）、从佛教取法，向墨子学习其“摩顶放踵”等一样，是陶行知个人道德修养极高、人格魅力巨大，成为大教育家的重要原因。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杜威与马克思唯一的共同点是注重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意义

上的实践，杜威不讲实践，只讲个人感觉意义上的行动，马克思则既讲个人经验感觉意义上的行动，更讲人类集体生活意义上的实践。马克思注重行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而杜威则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因为都重行动而将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为都重行动，就将杜威实用主义视为唯物主义。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新高峰，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思想影响巨大。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帕拉图、卢梭一道，被誉为西方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实践与批判的基础上，继承王阳明、杜威的哲学思想，在扬弃中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教育思想与主张，并身体力行，产生了重大的时代价值。

陶行知师承杜威，不过陶是秉持社会改造论，这与杜威的社会改良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既是陶行知超越杜威的地方，同时也是他自身内圣而外王的一个重要体现，即要实践通过内外兼修而铭佑于心的精神世界。

陶行知将其所经历的特殊国情与王阳明、杜威思想相融合，在王、杜二人的基础上不断生发并超越出新的内容。在谈到个人志向时，陶行知曾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sup>[47]</sup>这也是陶行知不断用内在理想来加以实践的内容。尽管有时悲壮得像一名烈士，他也在所不惜。1946年，在得知李公朴遇害后，陶行知在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信中表示，“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平时要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自己”<sup>[48]</sup>。这正是陶行知一生不断追求和超越王阳明、杜威乃至他自己的内在价值。他走了一条有别于心中圣贤和授业恩师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 【参考文献】

原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再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1] 陶行知: My Résumé And My Plan Of Life Career—To Dean J. E. Russell, 方明:《陶行知全集》第6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337页.
- [2] 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 [3] 陶行知:《行知行》,方明:《陶行知全集》第3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 [4] 周洪宇:《继承中的超越与超越中的继承——陶行知与杜威关系略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3年第4期,第27页.
- [5] [美]费正清:《陶行知与杜威》,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页.
- [6]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第2版.
- [7] 陶行知:《杜威将来华讲学——致胡适》,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 [8] 陶行知:《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一封公开信》,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 [9]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方明:《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10] 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 [11] 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 [12]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 [13] 陶行知:《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为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而作》,方明:《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 [14]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 [15] 陶行知:《能使全家识字的连环教学法——给胡适之夫人的信》,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 [16]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致王琳》,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 [17]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 [18]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方明:《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19]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方明:《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2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 [21]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
- [22] 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 [23] 陶行知:《从野人生活出发》,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6页.
- [24] [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 明日之学校》,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 [25] 张俭民:《“实用主义教育”与“生活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源”与“流”》,《当代教育论坛》2007年第1期,第31页.
- [26] 周洪宇、陈竞蓉:《中国最需要何种教育原则——克伯屈在华演讲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 [27] 周洪宇、陈竞蓉:《中国最需要何种教育原则——克伯屈在华演讲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 [28] 陶行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给文漾的信》,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 [29] 黄书光:《陶行知本土办学实践与“生活教育”的独特创造》,《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18期,第1页.
- [30] 陶行知:《学生与平民教育》,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 [31] 陶行知:《论中美两国关系——致美国杜威博士》,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0页.
- [32] 陶行知:《论中美两国关系——致美国杜威博士》,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3页.
- [33] 陶行知:《再论中国教育之出路》,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424页.

# 陶行知的赤子丹心家国情怀

## ——写给父母亲的颂歌

文/拱保罗 拱辰晖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之爱。母爱如水，父爱似山。古往今来，人们从未停止对慈母严父的赞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蓼莪》，就是写给父亲、母亲的感人诗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如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追寻陶行知成长之路。陶先生父母对陶行知一生的影响深远。父母给了陶行知生命，学贯中西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陶行知传承着中国人的基因。陶先生身上也流淌着父母的血。陶行知诗集中，他写给父母亲的诗歌，也焕发着陶行

知的赤子丹心家国情怀。

### 献诗

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蓝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

古城岩下，  
水蓝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34][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35][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36]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

[37][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 明日之学校》，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38]陶行知：《教学合一》，方明：《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9]周洪宇：《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40]陶行知：《〈战时教育〉半月刊方针——致戴伯韬》，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9页。

[41]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7页。

[42]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43]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45页。

[44]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45]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7页。

[46]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47]陶行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给文湙的信》，方明：《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48]陶行知：《为新中国之新教育继续奋斗——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方明：《陶行知全集》第9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的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二十年四月十日

注释：

1. 古城岩、水蓝桥均在安徽休宁县万安镇新安江边，有船可达杭州。陶家原来祖传开的酱园店，就在休宁万安镇。

2. 文中诗末记年代，均系民国纪年。民国二十四年即公元1931年。

《献诗》是陶行知生前所编的《行知诗歌集》的序诗。这首怀念父亲的诗作于1931年4月10日。

《献诗》之前，有陶先生写的一段序言。说明自己创作此诗的心情。

陶行知的父亲陶位朝是陶先生的第一位老师。陶位朝(1867—1915)号槐卿，字笑山。陶先生父亲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不善农事，一直经营父辈留下的“亨达官”酱园店。闲时读书自娱，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后来曾到南京女校做教师。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说：“余生在徽州，此乃一鲜与外界交往之地，余早期汉学教育受业于家父以及其他师长”。陶行知幼年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熟读唐诗宋词，影响到他后来作诗通俗易懂，成为诗风敦朴的人民大众诗人。

这首诗是陶先生回忆十七岁那年春天（1908年），由休宁万安赴杭州学医时，父亲送自己到水蓝桥上船的那番情景。陶行知父子之间感情笃深。时隔23年后，父亲虽然过世。但陶行知回忆父子离别之时，那依依不舍的一幕，却始终留在陶先生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真挚感人。

这首诗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前三句，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描述与父亲别离的场景。第二个层次，4-9中间6句，是全诗重点。写父亲送别爱子的无限深情。父亲“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他“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他一直站在水蓝桥边“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他恋恋不舍地“才慢慢的转回家去”。真是“儿子西辞古城头，求学别亲到杭州。孤帆远影碧空尽，为见江水天际流”。第三个层次，这首忆父诗作于1931年，父亲在陶先生赴美留学的第二年1915年故世。最后两句诗陶先生又回到现实之中。先生用拟人的手法发问：“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陶先生想到，父亲在他离开以后，一定是会伤心落泪，那么父亲的泪珠，留在哪一株芳草上呢。大胆神奇的一问，表达陶先生思念慈父的无尽的深情。

有父母亲人，心里是安定的。1914年，陶行知在美国读书。第二年，他父亲去世了。当他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悲之极，不得借事勉强忘之。下课后即到图书馆看书，不敢回寓，每至深夜始返。但梦中不能自主，悲怀一动，凄凉甚矣。”陶先生回忆那段难忘的生活，于1925年作《追忆美国得父歿耗之生活》。

我欲忙，  
我欲忙。  
忙到忘时避断肠，  
几回心内伤！

我欲忘，  
我欲忘。  
忘入梦中哭几场，  
醒来倍凄凉！

陶先生身在海外游学，父歿儿不能尽孝，只好通过奋发读书，想通过忙，借事强忘悲痛。通过忙，以求学有所成，来报答九泉之下的父亲。但这切肤之痛怎能忘却，睡梦中也要哭几场，醒来更加伤心难过。我们永远也做不好永别亲人的准备。但伤感过后，我们要尽己所能，带着对已故亲人的思念继续前行。

人生来会说的第一个词语都是“妈妈”。而人类各种语言中“妈妈”的声音都是相似的。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说：“一个为母亲特别钟

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陶行知就是为母亲特别钟爱的孩子。

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le第三声）（1866——1933年11月26日）是一位勤劳善良、富有好学精神的劳动妇女。她朴实忠厚、勤俭持家、性格爽朗。除种田务农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以补贴家用，她在歙县耶稣堂崇一学堂帮工时，工作踏实，深受教堂牧师赏识。陶母请求学堂照顾陶行知，让陶行知到学堂听课，唐进贤时任崇一学堂校长，唐校长同意了。自此陶行知开始在学堂学习。

#### 追悼慈母歌

慈母啊！慈母啊！  
流啊！流啊！大家流。  
慈母啊！慈母啊！  
流你爱流的热汗，  
一滴一滴滴成糙米饭，  
一吃一吃吃饱穷光蛋！  
爱妈呀，爱妈！  
爱妈呀，爱妈！  
背起你留下的重担。  
慈母啊！慈母啊！  
爱啊！爱啊！大家爱。  
慈母啊！慈母啊！  
爱你所爱的小孩，  
人人做成自动小工人。  
联合起来创造人世界！  
爱妈啊，爱妈！  
爱妈啊，爱妈！  
消灭那吃人妖怪。  
慈母哟！慈母哟！

注释：

本篇写于陶行知的母亲1933年逝世以后。

陶行知在1927年1月20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母亲：儿从母亲寿诞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为吾母庆祝并慰父亲在天之灵……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自立此志

以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陶先生把报答父母亲的养育恩情，“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完全献给国家”。从陶行知这封给母亲的家信看出陶先生内心写照：母子情深，无比感恩，感恩之余，无比激动。感恩、激动之余，必形于言，而言之不足，即发为诗。作诗歌颂“慈母”正是陶先生由衷之情，也是人间最美的诗。

#### 慈母读书图

##### （一）

吾母五十七，  
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于今，  
工学无虚日。

##### （二）

小桃方六岁，  
略识的和之。  
不曾进师范，  
已会为人师。

##### （三）

祖母做学生，  
孙儿做先生；  
天翻地覆了，  
不复辩师生。

##### （四）

三桃凑热闹，  
两眼呆望着。  
望得很高兴，  
祖孙竟同学。

##### （五）

上课十六天，

儿子来一信，  
老人看得懂，  
欢乐宁有尽。

(六)

匆匆六个月，  
毕业无文凭，  
日新又日新，  
苦口作新民。

(七)

病发前一夜，  
母对高妈说：  
你比我年青，  
求学要心决。

(八)

子孙须牢记：  
即知即传人！  
若作守知奴，  
不是中国人。

《追悼慈母歌》与上一首《慈母读书图》和下面两首《吾母所遗剃刀》《我的袜》四首陶诗，均出自1947年大孚出版公司版《行知诗歌集》。其中《追悼慈母歌》《吾母所遗剃刀》两首，根据诗歌题，追悼慈母、吾母所遗剃刀，可明确看出是陶先生在母亲去世以后所作。而从《慈母读书图》，第一首有“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是说陶母奋发读书时是57岁。而陶母57岁是1923年。“到今已十年”，到陶先生作诗时，母亲已经读书十年了。算起来，当时应该是1933年。陶母过世于1933年11月26日。从第(七)首，“病发前一夜，母对高妈说：你比我年青，求学要心决”。可以说是陶母生前对“高妈”的最后嘱咐。这样大概可以确定陶先生作诗时，陶母已去世了。

吾母所遗剃刀  
这把刀！  
曾剃三代头。

细算省下钱，  
换得两担油。

吾母治家，最为勤俭，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这把剃头刀现在是成了我们最可纪念的传家宝了。她剃过父亲的头，剃过我的头，剃过桃红、小桃、三桃、蜜桃的胎头。

注释：

“桃红”是陶先生长子陶宏，1915年出生于南京。“小桃”是陶先生次子陶晓光，1918年7月出生。“三桃”是陶先生三子陶刚，1919年11月出生。“蜜桃”陶先生四子陶城，1924年11月出生。

女人固然脆弱，但是母亲却是坚强的。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母亲始终一直陪伴在陶先生身边，陪伴四个孙子长大。母亲剃过陶先生父亲的头，剃过陶先生的头，还剃过桃红、小桃、三桃、蜜桃四个孙子的胎头。

母亲给三代人理发，不仅是勤俭省钱的事，方便了一家人理发，节省了陶先生和孩子们很多时间，而且还可以避免感染皮肤病。

我的袜  
吾袜真奇怪，  
半年穿两双。  
人笑我蹩脚，  
谁知我心欢。

这袜母所补。  
这袜儿所穿。  
儿穿母补袜，  
快活如神仙。

《我的袜》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尚不能确定陶先生作诗时间。千百年来，中国民间一直传颂着“孟母择邻”“岳母刺字”故事。历史上，每一位伟大人物背后，肯定有一位英雄母亲。为什么我的“两双袜，能穿半年这么长的时间？”，诗词一开始先提出问题。对这一问题，我和别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因为袜是母亲给我补的，“我穿母亲补的袜，心里快活如神仙”。母爱的温柔、无私、伟大的爱，呵护陪伴陶行知先生走过风风雨雨的岁月。这首诗可以与孟郊《游子吟》相媲美。是现代《诗经》的《蓼莪》篇章。

# 论陶行知的办学宗旨及启示

文/西南师范大学教科所 廖其发

## 一、办学“必须先定准方向”

办学宗旨是指办理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意图，有时又称之为教育方针或教育目的、教育目标。陶行知在办理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办学宗旨或教育方针的作用。他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教育，而且需要好教育。因此，需要改进或改革教育，以使坏教育变成好教育，使好教育变得更好。认为教育改进或改革包含两个方面：“有关于教育方针之改进，亦有关于教育方法之改进。”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改进特别是教育方针的改进非常重要，“教育方法受方针之指挥约束，必须与方针联为一气。”他说这好比航海，必须先定准方向。如果方向不定准，无论方法如何敏捷，都只是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终究不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如果只是空悬一方针，对于船身能否抵制风浪，水手是否干练勇敢，食料与燃料能够用多久，都没有打算清楚，那即使有方针，也难以到达目的地。“故方针不准，应当改进；方法不与方针一致，亦应当改进。航海如此，办学亦应如此。”<sup>[1]</sup>他所说的教育方针或办学宗旨的改进除了人格要求等基本层面外，还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层面：“第一层，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第二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吸收物质文明而保存精神自由并免去机械的人生观。”也就是说，教育方针或办学宗旨的改进是要认真解决以下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培养目标；教育的社会责任即教育在国家建设、世界进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所负的责任等。他认为这些方面关

《中国教育改造》是陶先生在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周年（1928年3月15日）之际，亲自编撰的一本教育文集。在序言中，陶先生说“当吾母六十寿辰，我立志将父母传给我最好的精神在中国教育上充分表现出来，作为我献与她的寿礼”（川版《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三页）。陶先生立志要把对父亲、母亲诚挚的赤子丹心，终养父母的感激之情，转化为服务祖国，报效人民，全力推行平民教育的实际行动。此次以后，陶先生要做到：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全年的生活，完全献给国家，作为父母亲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

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从感恩反哺父母，转变为感恩反哺祖国和人民，陶先生完成了从一位教育家到人民教育家的伟大质变，他为着人民的教育事业，承诺并践行了他的誓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博大胸怀，这就是人民诗人陶行知的赤子之心。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陶行知先生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理论，将永远激励着教育工作者，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育人教书。

2021年11月11日

系到教育究竟如何改革方能进步，“实属根本问题”。他所说的教育方法的改进所包括的方面更多：“学制，组织，行政，教师之训练，教材之选择与编辑，教学法之研究，校舍教具之设备，经费之筹措等种种问题，悉包括在内。”<sup>[2]</sup>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方针或办学宗旨的改革与学制、教育管理、教师训练、教材、教学法、教育经费等办学方法方面的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教育方针或办学宗旨方面的改革是根本的，它决定了办学的方向，是教育事业能否取得圆满结果的第一要素。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在办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活动中，都特别重视办学宗旨或办学目的、办学旨趣的厘定与阐释。强调“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并引孟子“先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的话，说明确立教育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的重要性。<sup>[3]</sup>陶行知先生关于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或办学宗旨的作用的思想值得当代中国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因为人的任何活动都应该具有目的性。明确的活动目的将使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它可以使有关活动向着预期的目标发展，从而获得预期的结果。没有目的的活动是盲目的活动，它的结果自然也不确定，甚至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活动目的的性质对活动结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错误的目的指导下的活动，只能产生错误的或没有有益价值的结果。只有在正确目的指导下的活动，才有可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此，一个明智的人在从事一项严肃的活动之前，总是要认真考虑这项活动的目的或所要达到的结果，并围绕这个目的来设计和从事相关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也总是要经常反思其活动目的的正确性、适切性，并对预定目的不合适之处做一些必要的修正，以使其活动目的更加正确、更加切合实际——教育是人类提高自身素质特别是儿童、青年素质的重要活动，它与整个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良好的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人们各方面的素质来促进整个国家民族各方面健康而又快速地发展，恶劣的教育则会毁坏人才

或使人们的素质变得低劣从而破坏或阻碍国家民族各方面的发展，我国与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生产能力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别的国家唯一不能与我国相比的是我国人口众多，但人口众多既可以说是一个优势，也可以说是一个劣势。如果说我们能够不断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儿童、青年的素质，使每一个中国人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具有十分优良的素质，那么中国将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中国就有可能持久、快速、健康的发展，中国就有可能逐步成为世界最为繁荣富强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就有可能永远处于幸福快乐的境界。如果国家不发展教育，教育工作者也不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那么我国人民的素质不仅得不到提高，反而将日益下降，人民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将日益削弱。其结果，国家将日益贫弱，人民将日益痛苦，内乱与外患将不断地交迫，亡国就为期不远了。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到，客观上教育工作者如何去教书育人，实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考虑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等目的性或方向性的问题。办学宗旨或办学方针、办学目的就是教育者对于所办教育的总方向、总目的或总结果的基本设想与规定。它是教育者办理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结果，是确定学制、教育管理、教师训练、课程、教材、教学法、教育经费等具体的办学方法与制度的根本依据，也是教育工作者从事各种具体的教育活动的根本依据，它决定了教育发展的性质，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认真研究办学宗旨这一重要问题，以便在头脑中形成明确而又正确的办学宗旨，从而使自己的教育工作少犯错误，多出成效。

## 二、“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

办学宗旨的第一个方面是教育应负的社会责

任，陶行知先生在不同的情景下对此有不尽相同的论述，但其核心要求都是“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sup>[4]</sup>陶行知先生在1927年4月2日写给晓庄乡村师范全体同志的信中提出：“深望诸同志努力合作，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二为一。我们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革命之出发点，并且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sup>[5]</sup>这就是说，办理晓庄乡村师范的社会目的主要是要谋中国乃至世界农民的解放，同时要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革命。这种雄心壮志，反映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要求。

同年他在一个教学讨论会上以小学教员对于社会改造为例子来说明教育应负的社会责任。他说：“大凡小学教员，没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便是很枯燥无味的。乡村教师与未来的乡村教师，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要把这个原有社会的恶习惯，坏事情，统统革出，把我们心中理想的新社会实现出来。”接着他进一步说：“无论什么人，一说到当教员必得有个理想的社会悬在心中……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应该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用教育的力量去变化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sup>[6]</sup>也就是说，陶行知先生认为每个教师都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要运用教育的力量去克服社会的弊端，将优良的东西充实到社会中去，以促成理想社会的实现。

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他提出要与全国一百万个乡村联合起来，推进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训练，“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sup>[7]</sup>也就是说，陶行知先生认为通过教育来推进中国当时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主、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建设，把当时的中国建设得伟大、可敬，是工学团教育的社会目标。

在抗战前夕，因国难当头，故他强调解决困

难是生活教育的历史使命：“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卸的天职了。”<sup>[8]</sup>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提出困难教育有三大目标：“甲、推进大众文化。乙、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丙、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sup>[9]</sup>这种教育目标的确定，反映了当时即将面临的全面抗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需要。

在创办育才学校时，他强调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他说：“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sup>[10]</sup>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止于大众之幸福”。“‘止’是瞄准的意思，一切所教所学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sup>[11]</sup>这就是说，增进人民的幸福，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抗战结束前后，他多次强调“教育为公”，教育要为民造福：“‘文化为公’‘教育为公’是教育目的……”<sup>[12]</sup>“教育为公达到天下为公。”<sup>[13]</sup>“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中国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sup>[14]</sup>陶行知先生对于教育的社会责任还有许多论述，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从陶行知先生关于教育的社会责任的论述和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企盼着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要求自己同时也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抱着“教育为公”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来改革社会的弊端，拯救民族的危亡，增进人民的幸福、创造一个繁荣富强和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他这



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办学宗旨，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继承，首先，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有可能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贡献。而要真正能够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贡献，他必须把自己的工作与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幸福或利益联系起来。一方面，他应当有高尚的社会理想。一个没有高尚的社会理想的人，他只关心自己的舒适安逸，成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甚至不惜以牺牲学生的利益，学校的利益，乃至国家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贪欲。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国家人民的罪人。一个有高尚的社会理想的人，他明了自己工作的正确方向，他能够为自己高尚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他将成为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在当代中国，这种高尚的社会理想应该是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繁荣富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起码也应当把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另一个方面，他应当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与自己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改良我国的社会，特别是要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来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实实在在地为我国社会的发展、为我国人民的幸福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 三、“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要完成教育的社会责任或社会任务，关键是要使受教育者具有相关的素质。同时，要使受教育者的人生丰富多彩，也需要学生具有相关的素养。因此，理想的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的问题。1943年9月25日，他在纪念广东百候中学复校10周年的诗中写到：“千教万教兮，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兮，学做真人。”<sup>[15]</sup>1945年，陶行知先生在《百候中学校歌》中写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sup>[16]</sup>1946年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也写到：“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sup>[17]</sup>他所反复强调的“教人求

真”“学做真人”，就是他理想的培养目标的高度概括。什么是他所讲的“真人”？或者说他对“真人”有的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对此，他在不同的办学时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具体提法。现以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为例来略做介绍和分析。

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2月在南京神策门外创办了晓庄师范及一些附属的教育机构，开始进行乡村教育试验。晓庄师范的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这一总目标具体化为五个分目标：“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sup>[18]</sup>晓庄师范的这五条具体的培养目标不仅体现了他对乡村教师的要求，也反映了他对一般学生的要求。如他在1928年5月15日~5月28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小学教育目标案》中规定：“小学教育应培养手脑双全、自愿自立立人的儿童。其目标如下：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体自治的精神”。<sup>[19]</sup>这里所谓的“农人的身手”或“劳动的身手”，是具备劳动者特别是工农所具有的那些实际本领。所谓“科学的头脑”，就是热爱科学，能够虚心学习科学知识、对于科学的发明创造及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有浓厚的兴趣、具有创新的精神与能力等科学素养。所谓“艺术的兴趣”，就是热爱艺术，具有艺术方面的知识有能力。“团体自治的精神”是“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改造社会的精神”，就是心中要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时要努力革旧创新，以实现“理想的社会”。

在创办晓庄师范期间，陶行知先生还强调教育者“应当放弃一切固有的伪知识”“应当拒绝承受一切新来的伪知识”“应当制止自己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于后辈”“陪着后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源泉。”<sup>[20]</sup>认为“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知识是真知灼见。”“不是从经验里发出来的知识是伪知识。”<sup>[21]</sup>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之一，是要引导学生去探索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真知识”或“真知灼见”。这也可以说是“科

学的头脑”的重要要求。

1939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该校后迁至合川草街子古圣寺），开始进行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的试验。他规定育才学校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其主要要求有三：其一是“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童与特殊教育”的人才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以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知能之基础。”其二是实行“知情意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其三是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智仁勇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谈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sup>[22]</sup>

后来他又对育才学校的优良传统作了总结：第一，“奉头脑作总司令。”就是要用理性的头脑来“指挥我们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作战”，不能让非理性的情欲“喧宾夺主来指挥我们行动”。第二，“止于大众之幸福。”求学不是为升官发财，“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第三，“全校团结成一个巨人。”“我们需要保持团结的优良传统，需要更高更坚定更自觉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的创造之成功。”第四，虚心学习。“虚心，虚

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虚心地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子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得专，也学得博。”第五，“建立起健康之堡垒”，“造成健康的堡垒，使得一点一滴的生活力与创造力都不致浪费。”<sup>[23]</sup>

陶行知先生还一贯重视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他说：“儿童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sup>[24]</sup>

陶行知先生对培养目标还有其他一些论述，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与抗战建国有关的各种素养，如要通过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大训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保卫祖国的体力与能力、较强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民主参政的能力、节制生育的意识，从而实现中国的强大、富裕、繁荣、民主、文明、优良等社会理想。<sup>[25]</sup>此外，陶行知先生有时强调：“培养合理的人生，乃是我们真正的宗旨。”也就是说，要使受教育者在一生之中，不仅个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sup>[26]</sup>陶行知先生还强调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有生活力的学生”，也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身体强健、责任心强、具有战胜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精神与能力的人。<sup>[27]</sup>

陶行知先生对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的论述及其他关于培养目标的论述在文字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后来的规定更为具体。也就是说，陶行知先生所要培养的“真人”主要有以下一些基本素质：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改造社会和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热爱真理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虚心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智仁勇等品质；具有博专结合而且有自身经验为基础的符合客观实

际的知识结构；具有较强的生活能力，包括较强的智能和能够做好各种实际工作的做事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具有艺术的兴趣与修养；具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卫生习惯、卫国的意识与能力；知情意和谐统一。

以上所述虽非陶行知先生关于培养目标论述的全部，但已可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第一，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学校管理者的头脑中应该有清晰、正确、全面的培养目标。现在有部分领导和老师是应付型的事务主义者，成天只是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和上课，特别是应付各种统一等试，因而往往缺乏远见和全局的观念，对于究竟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清晰、正确、全面的认识，因而也不可能把自己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与正确、全面的培养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其工作的成效或价值也必然要大打折扣，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自然不如人意。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像陶行知先生一样怀抱一种高尚的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理想，认真关心培养目标这一重要问题，使自己的每一项活动都能够为正确、全面的培养目标的实现服务。第二，要注意培养学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现在不少中小學生乃至大学生、研究生为了应付升学和寻找一个好的工作的需要，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知学好相关知识与技能，甚至去学习如何投机钻营，没有高尚的社会理想，没有献身国家民族利益与人民幸福的精神，没有追求真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没有高尚的道德观念。这样的人必然会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碌碌无为的人，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贪欲无度、危害社会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全国将会是一盘散沙、内乱不已、外患交至，必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时时关注学生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培养。第三，要使学生形成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由于应试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现在有不少中小学特别是中学只关注升学考试所要求的那些教育内容，而不是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来安排教育内容，其结果是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如过

早地文理分科，乃至文理内部也过早偏科等。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使学生视野狭窄、基础单薄、缺乏发展的后劲、缺乏创新力，其生活也将因此而缺乏质量。因此，应当从中小学开始，重视学生博专结合的知识结构的构建。第四，关心学生生活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要使学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特别是为社会作出有较大价值的贡献，必须使学生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如较强的智力、管理能力、交往能力、预测与决策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创新能力等。第五，既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一般素养，也要重视发现和培养学生的特殊才能。可以说，很多学生都有一些特殊的潜能，如从事艺术、体育、文学、科学、技术等专门领域所需要的某些特殊潜能，如果教育工作者在培养学生一般素养的同时，注意发现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那些特殊能力，这些学生就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才。第六，真正理解并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陶行知先生关于培养目标的思想实际上与我国现在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在教育实践中也特别注重学生在德智体，知情意、智仁勇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对于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学习。要真正领悟全面发展的精神，并且要在教育实践中努力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或教育理想。此外，还应该像陶行知先生一样，注意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地对学生的素养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概言之，陶行知先生办学宗旨方面的思想十分丰富，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我们应该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将它发扬光大。

#### 【参考文献】

原载《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编写组编。

[1]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161.

[2]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62.

[3]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666.

[4]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16-217.

[5]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69.

[6]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16-217.

[7]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80-281.

[8]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530.

[9]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534.

[10]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666-667.

[11]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42.

[12]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82.

[13]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92.

[14]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94.

[1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组.《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15.

[16]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830-831.

[17]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821.

[18]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16.

[19]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10.

[2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95.

[2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86-87.

[22]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668-670.

[23]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41-743.

[24]江苏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49.

[25]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46-547.

[26]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568.

[2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文集》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641.

#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连载之二)

文/孙朝云

## 二、呼唤“救救孩子”的戏剧组

### 戏剧大腕纷至沓来

育才学校诞生于战时首都的重庆，随着国民政府全部移驻重庆，各机关遂大规模西迁。与此同时，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全国各地的俊士豪杰、社会名流，也荟萃重庆，重庆成为中国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精英与资源于一地的城市。

育才学校戏剧组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为抗战救国，为中国的戏剧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校的课程分为普修课和特修课。戏剧组的普修课有语文、算术、英语、科学方法论四门；戏剧组的特修课即专业课，有戏剧理论、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台词、形体训练、化妆、戏剧艺术概论、中国戏剧运动、表演艺术论、导演艺术论、剧作概论、世界戏剧史纲等。

当时，陶行知邀请了戏剧界的老前辈到育才学校任教，戏剧、电影教育家章泯，电影导演张水华（水华），剧作家戏剧电影评论家舒强、舒非（袁文殊），戏剧家沙蒙、刘露、卫禹平、江风等开学之始即到育才戏剧组；戏剧理论家活动家刘厚生1941年到育才戏剧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1942年4月到育才戏剧组；后来

陶行知又邀请了戏剧家钱风、李乃忱和诗人作家杨山等进步专家任教。



戏剧组主任章泯

首任戏剧组主任是章泯，之后有舒非、舒强、刘厚生、夏衍、方琯德、杨山等担任主任。担任戏剧组教师的还有沙蒙、江风、舒菲（袁文殊）、刘露、逯裴、张宜天、王家宜、钱风、田汉、汪巩、李乃忱、杨山、方琯德等。还有协助戏剧组排练的儿童剧作家董林肯、导演张石流、舞美设计任德耀等戏剧界人士。

章泯教授戏剧理论，张水华教授导演，舒强教授表演兼化妆，舒非（袁文殊）戏剧组第二任主任，刘露教授舞美，卫禹平教授声乐，江风教授台词、普通话，钱风教授形体训练，刘厚生负责排戏。

章泯在戏剧组里提出了深受全体师生欢迎的倡议：“把戏剧组建成个快乐的群体！”要求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亲密合作，因为戏剧是一种集体艺术。经过酝酿，大家决定把每周一次的生活讨论会改为隔周一次，另外隔周增加一次师生同乐会。这个建议一通过，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把校外东边荷花池旁的小山头作为同乐会的最佳场地。他还在课堂上不断强调，学戏剧艺术不是好玩，而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舒强教表演，他要求每个同学端起满满一碗水走到他面前，不允许水洒一点儿出来。然后他要求同学们回忆刚才的情景，做出端水的样子走到他面前，以训练注意力集中，重新体验一瞬间的思想感情。每当同学们激烈的争论结束，他就要求同学们赶快分析刚才的争论，成为“情绪记忆课”。



水华

水华担任导演课，通过排练实践进行，理论性很强，学起来却并不枯燥；刘露教舞美，要求每个人都学绘画，从中讲构图等，以及舞美发展史；江风教台词，由于同学们来自15个省，讲话南腔北调，就教大家需要先学拼音。

育才学校戏剧组排练演出了《抗战八年胜利》（陕北秧歌剧）、《王婆骂机》（四川鼓书）、《划龙船》（湖北旱船调）、《表》（儿童话剧）、《小主人》（儿童话剧）、《不太平》（四川方言话剧）、《啷格办？》（四川方言话剧）、《荒岛历险记》（话剧）、《打面缸》（殷野用京剧形式改写的小话剧）、《退费》（邹绿芷改译的独幕趣剧）等。戏剧组与音乐组合作，创作了《王大娘补缸》《采莲船》等节目。育才学校戏剧组的节目主要都是在北碚、合川和重庆演出。1948年，迁往上海的育才戏剧组又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小主人》，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大为赞赏。

杨山写了《从黑夜到天明》（活报剧）到重庆大学广场演出，非常成功；写了短剧《小先生与老先生》《麦克阿瑟过圣诞节》（独角戏）在戏剧组排演；写了儿童歌剧《大豺狼》发表在戴自俺主编的《重庆少年儿童》月刊上。



杨山

20世纪40年代，先后又有《怒吼吧！中国》《夜店》（高尔基的这个剧本后来一共有10个译本）、《浮士德与城》《丹东之死》《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等20多种俄苏剧本被译成中文，育才学校戏剧组也是率先演出中国剧作家翻译或改编的俄苏戏剧的中国十余个剧团之一。

此外，田汉、夏衍等都曾到育才学校授课或作报告。

### “雾季公演”一炮打响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也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演艺界名流荟萃，文艺演出空前繁荣。但由于日本飞机经常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主要有怒吼剧社、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等50多个艺术团体。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夏衍、洪深、老舍、曹禺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金山等。



1941年日机对重庆野蛮轰炸时产生的滚滚浓烟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紧政治迫害，强化文化统治，重庆犹如一座“死城”。1941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他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个时段山城笼罩在浓雾中，难分东西，日

机无法空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文化委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团结文艺界朋友，利用重庆的雾季开展戏剧活动。从1941年到1944年连续四年在没有空袭的雾季期间举行了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形成了抗战时期重庆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1941年到1945年间的“雾季公演”持续了四届，演出了大型化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给在战争恐怖和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山城人民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坚强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战决心。周恩来等南方局的同志除经常到剧场观看演出外，还参与到戏剧的创作和评论中，与戏剧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重庆“雾季公演”时期周恩来与郭沫若、阳翰笙的合影

在抗战烽烟中连续举办四年的“雾季公演”，有力动员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话剧大军，在团结民众、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给予了在战争恐怖下的山城人民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坚强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使他们熬过了严酷的冬天，迎来民族解放的春天。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的《大地回春》，打响了重庆“雾季公演”第一炮。

育才戏剧组在重庆“雾季公演”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演出了三部儿童话剧。

1941年，重庆“雾季公演”开始后，陶行知先生决定让戏剧组排演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著的中篇童话小说《表》，以参加大后方蓬蓬勃勃开展的戏剧活动。小说《表》描写的是苏联建国初期流浪儿童彼得加在受到少年教养院



抗战时期，中华剧艺社在重庆“雾季公演”首演《大地回春》，秦怡（左）饰黄树惠

的教育和感化后，将偷了一年的金挂表归还失主的故事。这个动人的故事，在当时有着对当政者的批判和引起社会重视的现实意义。该剧由董林肯改编成5幕儿童话剧，刘厚生任导演，苏丹任舞台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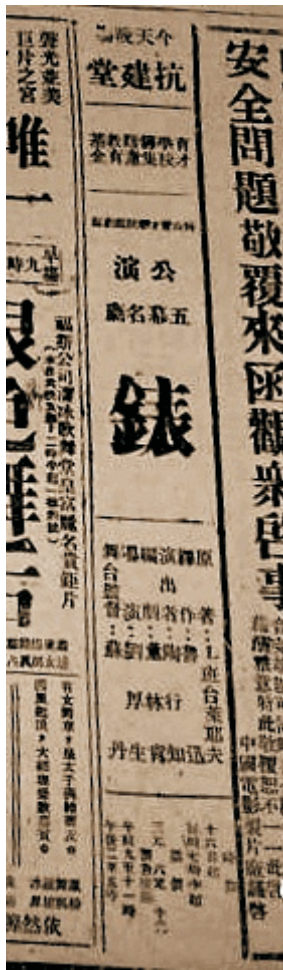
重庆首届雾季公演（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抗建堂举行，育才学校戏剧组中于1942年1月16日至20日演出了《表》共5场。《新华日报》于1月15日和18日两次刊载了演出《表》的广告。

《表》的现实意义和富有儿童幻想的童话式的布景设计营造出了新鲜明朗的舞台气氛，加之小演员们真挚动人的表演，得到了重庆戏剧工作者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赏，也为学校筹募办学经费以极大的帮助。《新华日报》在1月19日第二版刊载了章罍所写的题为“在重庆舞台的‘表’——育才戏剧组首次公演记”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批没有经验

的孩子们所创造出来的成绩，所以值得我们去夸奖和称赞，而实在是聪明的孩子们在较合理的教育下的进步使我们惊异。我真不知道那些自命天才的前辈们怎么会叹息后继无人的！恐怕可担心的倒是这些新生命迅速地追赶上来，而光凭着年代的经验而自满的艺术家们，就要渐渐衰颓陨灭了。”

1947年4月10日，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1957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任德耀被宋庆龄任命为第一任团长。

选择的首演剧目就是原育才学校董林肯编剧、鲁迅翻译的苏联儿童剧《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而这个儿童剧团的具体组建人也是原育才学校的舞美设计、儿童戏剧家任德耀和导演张石流。在此演出《表》的编创人员是：演出顾问熊佛西、黄佐临；导演张石流；舞台设计任德耀。宋庆龄观看演出并会见演出人员。



《表》在1942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的广告



宋庆龄观看儿童剧表演后与演职人员合影（宋庆龄后戴眼镜者为任德耀）



后移至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剧场、法国公立学校大礼堂（今科学会堂会场）公演，共演出8场，其中为贫孤儿童义演2场。《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时代日报》《新闻报》《联合晚报》《和平日报》《大陆报》（英文）等作了报道，《新少年报》出版专页，洪深主编的《大公报》副刊《电影与戏剧》出版特刊。熊佛西、刘厚生、梅朵、尼金等人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儿童剧团的成立和《表》的演出，对推进中国儿童戏剧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同年7月30日，宋庆龄为剧本《表》出版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中国福利基金会办的儿童剧团，曾在上海演出，成绩良好，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表》剧本于民国36年11月由立化出版社出版。

### 《小主人》成“雾季公演”佳剧

1939年三月的一天，在重庆市泰邑小学的礼堂里陶行知先生在给小朋友演讲，他说：“小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大时代的儿童是要做小先生的，就是把小孩所知道的事情，认识的字，去教一般文盲的大人，使他们也能认识字，知道国家大事和抗战的重要，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们要去做小工人。我所说的工人，并不是造桌子椅子才是工人，这一种工人是大家用脑和手合作，将自己的国家、团体和学校造好，在里面不要做不利于学校团体和国家的事，同时要常常用脑子想，怎样才会使自己的团体、学校、国家健全成一个好的工作团体、好学校、好国家呢？再努力用手去做，这也叫小工人。”“你们不单是未来的主人，现在也是国家的小主人！可是当主人的，就应当有责任。日本鬼子这样不讲理的欺侮我们，占我们的土地，屠杀同胞，奸淫妇女，眼看着秀美的河山快要给鬼子抢夺完了，你们当小主人的都要负起责任来。大家要照着总理遗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第二届“雾季公演”（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中，1943年4月7日，育才学校戏剧组

演出了4幕儿童剧《小主人》，获得更大的成功。

《小主人》仍由董林肯编剧，刘厚生导演，苏丹任舞台监督。剧中的音乐由庄严作曲，任德跃为布景设计，章超群为灯光设计。这个戏描写一群渔家儿童在战乱中失散，流落到大后方，饿死在街头，而后方的富家弟子却在娇生惯养中养出一身臭毛病；描写小学生们义演、义卖玩具，救济难童。剧本的题材很现实，有力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加上几支优美感人的歌曲，整个演出的艺术感染力很强，真是感人心弦，催人泪下。公演了5场，每场演出闭幕时，观众都是沉重地擦着眼泪离开的。这出戏在北碚演出时，著名历史学家、育才教师翦伯赞看了便悲愤得痛哭失声。八路军办事处的许多同志看了这出戏也备受感动。该剧因“剧情动人，演技亦佳，戏剧界公认为今年雾季重庆演出中佳剧之一。”



钱风老师给《小主人》演员化妆

《新华日报》在同年4月12日至21日的10天时间内，连续发表了5篇观后感。文章说：“育才的孩子们在艺术上的成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不仅是他们在工作的认真和努力上值得赞许，而且他们在平常学习中的进步也是非常惊人的，他们已不单是按着导演先生的指导来做，而且是自己创造。他们是用自己过去的现实生活来丰富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因此演的那样自然那样真实。……我们看不到一个动作或一句话不是出自于内心真实的感情。这一点在一般的演出中是少见的。”“我们恳切地希望这次演出，能够胜利地把所提出的问题，推进社会人士的心田，使大家注意到战区灾区的儿童，街头流浪的苦孩子，救救他们，保卫他们。”



《小主人》公演剧照

“雾季公演”后，1943年4月24日至26日，又在北碚民众会场连续演了3天，在合川银官大戏院上演4场，常常客满，获得了与雾季公演时一样的成功。虽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捣乱，但在群众的支持下，经过老师们的斗争，最终胜利地完成了在北碚的演出。



《小主人》公演剧照

但是在《小主人》演出后，重庆的政治环境又开始恶化，进步戏剧运动又受到反动派的压制和排挤，育才的处境也愈益困窘，学校越来越穷，戏剧组只好回到草街子乡下，在文化和业务学习之外，只排练了场由《十五小豪杰》改编的《荒岛历险记》，在北碚、合川试演两场，没有公演。

1948年，迁往上海的育才戏剧组又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小主人》，轰动上海，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大为赞赏。

### 《啷格办？》引起戏剧界轰动

1944年，日本侵略者猖狂紧逼，西南大后方

烽烟四起，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该怎么办？共产党提出了大后方群众就地抗日的方针。育才学校为宣传这一方针，于是，经师生们讨论后，戏剧组学生张本志（原剧本署名张玮，现名师陶）依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了大后方小山沟里一家淳朴农民，老少三代被日本鬼子逼得家破人亡的3幕四川方言剧《啷格办？》。“啷格办”是四川方言，即怎么办，是以群众熟悉的语言，讲述群众身边的事情，回答他们困惑的问题。该剧由育才学校戏剧组演出，钱风老师担任导演。这是育才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戏，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溃逃，而群众组织游击队抗日的故事。



戏剧组演出前化妆（后左三为戏剧组教师舒强）

剧中人物都是师生们天天在一起摆龙阵、教识字、教歌教舞生活中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民原型。角色的扮演者是：

老大爷——徐孝元饰演。

老太婆——首演由文学组章静饰演，公演由李家琪与胡奉文饰演（胡奉文现改名为文玮）。

大儿子——李维汉饰演。

小儿子——王万恩饰演。

幺妹子——程代辉饰演

儿媳妇——首演由章恒饰演，后由舞蹈组吴艺饰演，公演时为章晴兰同学饰演。

胡春发——罗坚饰演。

学生娃——王心玉、王心华姐妹、郑朝、赵家平、刘卯钊、尤在等同学饰演。

《啷格办？》首演于育才学校露天舞台，观众都是凤凰山附近的各村老乡与育才同学，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初一次娱乐晚会上。观众看了演出反应非常强烈，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从桂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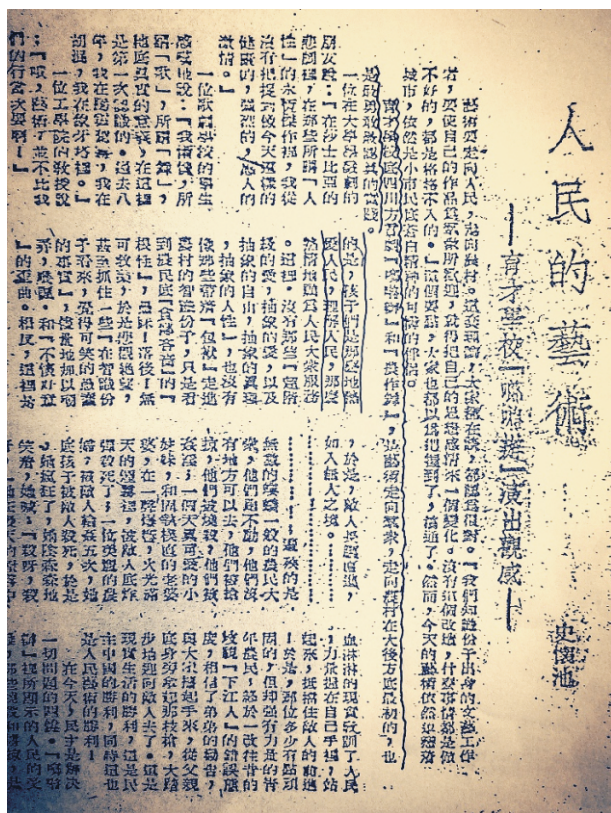
戏剧组在排练节目

到重庆刚来育才学校戏剧组的戏剧家钱风先生正好看了这场演出，他为孩子们演出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一出基础很好的戏，如果进行打磨就能更加出彩。于是他和张本志等同学反复修改、排练，制作服装、道具，等待时机外出公演。

1945年1月，束衣人先生联络戏剧组去北碚夏坝民乐园演出《哪格办？》。演出取得极大成功，引起了群众的轰动。同时也激怒了反动派，他们采取卑鄙的手段，撕毁演出海报、殴打演出人员，切断演出电源迫使演出中断。而北碚地区的几个大专院校如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剧专、歌剧学校、音乐学院的同学，都大力支持和赞助演出。由剧专出面约请演出人员开茶话会，表示对反动派的愤慨和谴责，并鼓励戏剧组继续把戏演下去。

接着2月19日至22日，由在沙坪坝中央大学的《大学新闻社》宣传负责人刘宪贞出面，托束衣人邀请戏剧组到沙磁学校区的学生群体中去演出，地点在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大礼堂。这次演出是一个大的突破，编剧张本志回忆说得很精辟，他说：“这次演出是在国民党脸上的‘三角地带’敏感区‘弄枪使棒’，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观众之活跃，反映之强烈，票房价位之高，演出之成功，都是意想不到的。这次演出对于学府区学生的民主运动，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净化 and 升华，都是一次促进。”

1945年5月4日至7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与舞蹈组一起，在北碚民众会场演出了4场《哪格办？》和舞蹈节目，演出非常成功。



新华日报刊登史怀池的《哪格办》评论文章

《新华日报》连续7次报道了话剧《哪格办？》的演出和评论。5月23日史怀池（即《中国学生导报》的负责人束衣人）的文章说：“艺术要走向人民，走向农村。这套理论大家都在谈，都认为很好。”“育才学校的四川方言剧《哪格办？》和《农作舞》，是艺术在走向群众，走向农村在大后方的最初的，也是最勇敢最认真的实践。”“《哪格办？》是与现实紧紧地连接着的，它是现实生活血淋淋的反映，同时也从现实生活中得出了《哪格办？》的解答，指导了现实。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功。”“愿《哪格办？》四川方言剧，是大后方人民艺术的一个起点。愿一切后方文艺工作者，向育才的孩子们学习，使艺术真正与人民连结起来。”

日本投降后，形势有了改变，反侵略的内容变成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内容。于是又对《哪格办？》作了适当的修改，12月10日至13日，以育才实验剧团的名义到北碚儿童福利试验所举行了第二次公演，同时还演出了《王大娘补缸》《农作舞》等节目。十多天后，《哪格办？》又在重

庆再次公演。12月27日至1946年元旦，《啷格办？》在重庆江苏同乡会演出4场，还加演《东方土风舞》《新疆舞》《农作舞》《王大娘补缸》《西藏舞》，受到观众热烈赞扬。并在报纸上登载大幅广告，说这是“抗战胜利以来的大清算：黔桂逃难周年血祭”。



《新华日报》刊登《啷格办》广告

1946年1月5日至9日，《啷格办？》一剧应观众要求，在中国艺术剧社的主推下，又在抗建堂公演了5场。《新华日报》每天刊登“中国艺术剧社主催”的大幅广告，并在4日用“‘啷格办’明日复演”的醒目标题作了报道。



1946年2月19日，育才实验剧团在重庆沙坪坝演出四川方言话剧《啷格办》后合影

1946年2月19日至22日，应中央大学《大学新闻社》的邀请，为他们在学府区女子职业大学大礼堂义演4场，同时加演了4个歌舞节目，弥补他们活动经费的不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育才学校戏剧组陈一坤、尤在等直接参加革命并被送往延安；张本志、胡奉文等投身华北解放区；申非伊、王万恩、唐南宁、李庄、吴振邦等投身苏南游击区；赵家平等投身浙南游击区。

### 喜爱唱歌和舞蹈的程代辉



程代辉

程代辉，女，1930年10月出生于重庆巴县，11岁时父亲逝世，之后哥哥又被日本的飞机炸死，在读小学的她被迫辍学。

自小她有唱歌跳舞的天赋，1942年12岁时姐夫和好友便把她送进了孩子剧团，成了革命文艺队伍里一名小战士，被团里送去新中国艺术剧社参加《家》的演出，饰演小淑贞。由于她小学未学完，1943年原在育才学校戏剧组任主任的章泯，便把她送到育才小学部学习。她不仅能看到

专业组的哥哥姐姐的各种演出，还常常去看他们弹钢琴，甚至有时将曲调和指法都默默记在心里，回到小学部在风琴上弹出来。她偷偷学琴的事儿，被庄严老师知道后告诉了陶行知校长，陶校长把她叫到逸少斋问她：“代辉小朋友，你喜欢音乐吗？”“是的，我很喜欢音乐。”代辉答道。陶校长又问：“学了音乐干什么呢？”“为穷人唱歌！”代辉毫不迟疑地回答。陶校长听了很高兴，又叫她跟着音乐组的庄严老师打拍子，考查她的节奏感。还叫她试着编一首歌唱来听听，她壮着胆子即兴编了一首歌认真地唱了起来，把陶校长和庄严大哥都逗乐了。从此，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待遇，与音乐组同学一样，每天有半小时练习钢琴的权利，并且还有庄严大哥指导。

1943年12月18日，自然组举行了一场艺术的、科学的、教育的综合歌舞剧《化学之舞》的科学晚会，自然组全体参加，音乐组、戏剧组个别同学参加创编，小学部的程代辉被邀请饰演其中的“溴”原子这个角色，可见这是自然组对她唱歌和表演能力的多么大肯定呀！

1944年2月学校学习南泥湾精神，要应征30个勇士去北碚澄江镇嘉陵江边马家沱“光铁坡”开荒建农场，陶行知便写了一首《今征三十士》的诗，张贴在壁报栏内，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加“光铁坡”垦荒种地。小学部年龄小的不能参加，可是她却想法子要参加进去，于是，又发挥起他的优势来，这个刚入校半年的代辉把这首诗编成歌唱了起来：

荒地五百亩，  
英雄好战场；  
今征三十士，  
有力共开荒。  
种杂粮，  
养猪羊；  
年成坏，  
求饥肠；  
年成好，  
幸福无量。  
小凤凰，

羽翼强，  
飞去光铁坡，  
创造新家乡。

她的歌，赢得开荒勇士们的一阵掌声。

陶校长考虑到她曾在孩子剧团待过，有过当小演员的经历，并未安排她进音乐组，而是让她进了戏剧组。



音乐、戏剧、舞蹈三组部份师生合影（前排左一为程代辉）

在戏剧组里代辉得到机会，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戏剧表演理论、角色塑造基本知识和节目排练的方法技巧，他的进步很快，得到很多表演的机会，不仅在校内饰演话剧角色，如戏剧组创作的《小主人》《哪个办？》中分别饰演“小姐”和“幺妹子”，而且还在著名作家吴祖光著的《风雪夜归人》中饰演“小兰”，著名编导欧阳予倩《关不住的春光》中饰演文工团员……在育才七年，她参加了不少的大型公演，为她从事艺术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4年9月，应陶行知聘请，从英国归来的舞蹈家戴爱莲辞去了在国立歌剧学校和社教学院电影文化速修科任教的工作，到育才学校舞蹈组任主任，成立舞蹈组。两个月后，戴爱莲便带领舞蹈组接连在重庆、沙坪坝和北碚等地公演，便大受欢迎。戴爱莲的到来，舞蹈组的演出，使程代辉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舞蹈的深深喜爱，从此他便定格在了舞蹈艺术的志向上。这并非她转入了舞蹈组，而是她自觉地如饥似渴学习舞蹈，不断地向戴爱莲、吴晓邦等名师学习舞蹈。但凡舞蹈组的排练和演出，他一有时间就必去观看，从不放过，经常还手舞足蹈起来。每当看到戴爱莲的独舞《仙女》和戴爱莲编排的由学生隆徵丘

和周令芳表演的古典芭蕾双人舞《梦》，吴晓邦创编并演出的《饥火》《网中人》《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舞蹈时，都会深深地打动她，激励她对舞蹈的热爱。她一方面在戏剧组参加演出，另一方面又在舞蹈组参加一些演出，为了舞蹈，再苦再累她也心甘情愿。她说在跳新疆民族舞里有一个扭脖子的动作，他不会，就天天对着镜子苦苦地练习，直到练会为止。

育才戏剧组随音乐、文学、绘画组迁到上海大场后，得到白俄罗斯芭蕾舞专家格雷斯诺娃的芭蕾基本功教学，每周一晚上有一小时的课，代辉一个人从郊区大场走到租界霞飞路，抹黑来回，春夏秋冬，从未间断，学得辛苦，也学得扎实。在庄严老师的鼓励下，她开始试着编舞，她编的第一个舞是《边疆舞》，虽然不长，但很快在学校和大学生中流传开来。她还得到在育才教现代舞的美国现代舞专家索菲亚·戴尔莎的关心和指导，使她受到了中国民间舞、西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综合培养教育，以致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舞蹈家。

1949年，上海组织学习队到武汉吴晓邦舞蹈学习班学习，育才学校选派她和王惠利同学参加。她聆听吴老师的“舞蹈理论课”“自由创作课”和“自然法则课”，观摩吴老师的《进军舞》《鄂伦春》及苏联《红军舞》等舞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舞蹈，她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很大压力。

1950年程代辉从育才学校调入北京中央戏剧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简称舞运班），担任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的助教。这个训练班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在中央戏剧学院开办，为各省、市、自治区培养新舞蹈运动干部的两个舞蹈训练班之一，由吴晓邦担任班主任。另一个是由朝鲜舞蹈家崔喜来担任班主任的“崔承喜舞用研究班”（简称舞研班）。吴晓邦曾在重庆育才学校舞蹈组任教，这是他对程代辉的信任。训练班课程有：1. 自然法则、芭蕾舞、中国古典舞等舞蹈基础技术课；2. 文艺理论、舞蹈理论等舞蹈理论课；3. 创作实习课；4. 舞台美术课；5. 音乐课；

6. 文学课；7. 政治课。训练班的教员有叶宁（亦曾在重庆育才学校舞蹈组任教）为组长的教研组，程代辉是基础业务教员之一，她一面跟随吴老师参与同学们课堂教学工作，一面和叶宁、骆璋负责芭蕾舞教学。这两个班的学习期间均为一年半左右。在这两个班学习的中国学员们，大多都成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骨干力量，许多人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舞蹈演员、编导、教员、理论研究人员和组织活动家。在中央戏剧学院期间，他曾随中央民族文工团去贵州采风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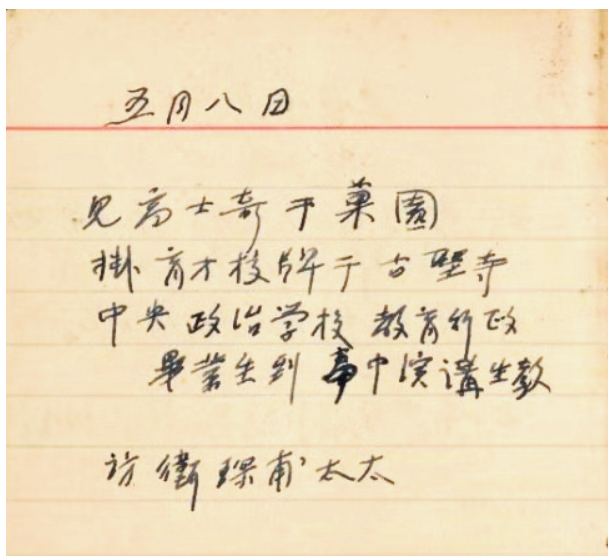
程代辉编导的《东方红》第六场中的新疆舞（电影翻拍）

1953年程代辉分配到北京中央歌舞团任舞蹈演员后，进入了中国艺术团，并赴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参加第四、五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两次获演出二等奖。1958年调入上海歌剧舞剧院任舞蹈演员，自己编舞、作曲，创作了《小车舞》和《炼钢舞》等舞蹈。1960年调到上海舞蹈学校任教员兼编导，在这期间她还担任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1964年国庆程代辉编导的《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出，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她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接着又参加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首演，引起了全国轰动。1966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1969年调上海芭蕾舞团任编导。1972年夏，参加上海舞剧团赴朝鲜、日本演出。1979年，任上海芭蕾舞团舞蹈编导，直至离休。1982年获“上海之春”华东六省一市独舞、双人舞比赛创作二等奖；1994年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金奖。

### 育才学校永恒的守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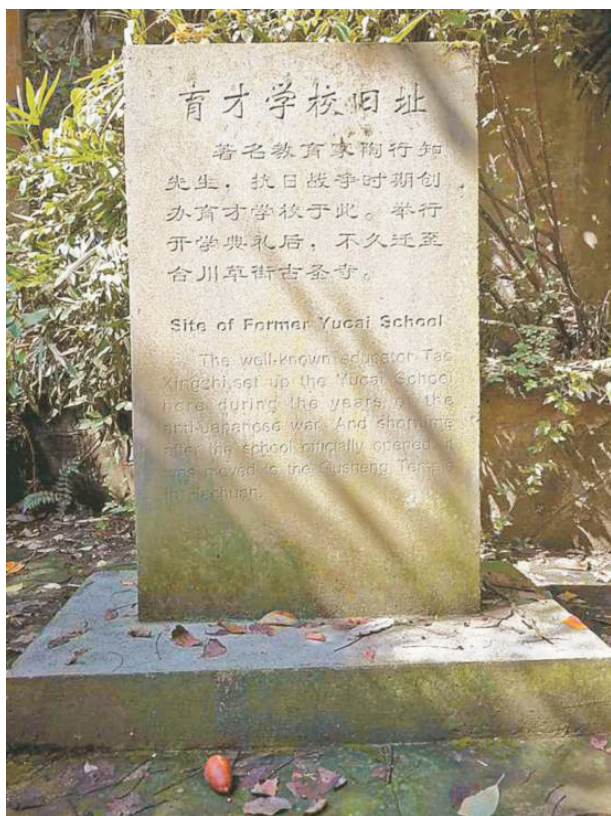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9日，在香港组成育才学校董事会，由张一麟任董事长，许世英、吴涵真、李晋、何艾龄、崔载扬、陶对庭、张宗麟和陶行知任董事，陶行知任校长。董事会通过《私立育才学校校董会章程》和《创办育才学校意见计划书》，确立“研究天才教育，培养天才被难儿童，俾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办学宗旨。赈灾委员会同意陶行知的申请，拨付4.8万元开办费和每月3000元经常费。北碚的地方政权同意立案，准予开学行课。又经北碚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和合川县乡绅赵璧光协助，租得凤凰山上的古圣寺。

古圣寺原名虎声寺，建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重建寺庙时，因掘得明隆庆年间“洪钟”“残碣”，更名古圣寺。清咸丰元年（1851年）再建。寺坐北向南，中轴线上依次为大山门、牛王殿、大雄殿、观音殿、善堂等，两边分设配殿及厢杂房十余间，呈复四合院布局，总占地3375平方米。寺内建筑雕梁画栋，屋顶飞檐起脊，雕工精美，具有重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陶行知先生在这里办学，将原古圣寺牛王、观音殿作为育才学校教室和读报室，两侧为办公室；大雄殿正中为礼堂，两侧为教室；余房为师生宿舍。陶行知住在距古圣寺右侧约200米远的“逸少斋”草屋里。



陶行知1939年5月8日日记影印

1939年5月初，在北碚清凉亭挂出了“育才学校筹备处”牌子，然后分兵四路，开展紧张的建校筹备工作。接着5月8日在古圣寺挂出来了陶行知校长亲自题写的“育才学校”校牌（在陶行知当日的日记里记载的第二件事即“挂育才校牌于古圣寺”），从此，一座古老的寺庙承载起教育培养人才幼苗使之成为抗战建国的有用人才的历史使命。



育才学校开学典礼校址碑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教师和先期抵达的40余名难童借北温泉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至今在北温泉公园还有一块育才学校校址碑），一月后迁入古圣寺正式行课，此时学生已达71人。年底，在校学生增至近百人，教职员工约60人，到1940年4月，学生人数达到168人，他们来自17省的难童，见下表：

育才学校学生来源籍贯统计表				
院名	人数	省名	人数	备注
直院	32	江苏	23	
直院	12	浙江	4	
直三院	8	安徽	19	
川一院	36	江西	2	
川二院	4	湖北	62	
川五院	9	湖南	4	
川七院	10	四川	14	
川八院	6	福建	1	
蓉一院	4	广东	2	
蓉二院	1	广西	1	
蓉马院	4	贵州	2	
中大保育院	2	河南	19	
教育院	2	河北	2	
新安旅行团	1	山西	3	
孩子剧团	1	山东	2	
七七少年剧团	1	辽宁	1	
朝鲜	3	吉林	4	
自费	32	朝鲜	3	
共计	168	共计	168	
(原载1940年5月1日出版的(战时教育)第六卷第一期《育才学校专号》)				
编者注：“院名”即“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所属的各保育院。				

育才学校按照学生各自的特殊才能和爱好，分别编在音乐、戏剧、文学、绘画、自然和社会科学六个专业组学习。以后又增设了舞蹈组、普通组（吸收本地农村的青少年）和小学部。普通组和小学部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础知识学习后，再根据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分别分到各专业组进行培养。在专业组学习的学生，如果中途发现不适合所学专业便可以转组。

师生们都喜欢在校门的校牌下照相，留下自己最自豪最荣耀的时刻。1940年戏剧组的张鸿眉和孙佩丽两个同学“育才学校”校牌下的留影，她们那端庄秀丽的仪态，欣喜微笑的表情，自信阳光的精神面貌，给人们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称她俩是“育才学校的守护者”。



张鸿眉（左）孙佩丽（右）（拍摄于1940年古圣寺育才学校）

巧的是，1997年她俩相约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偶然发现了57年前她俩在育才学校校牌下的照片，感到非常荣耀和自豪，于是她俩兴高采烈地又在自己的照片下留影纪念，创作了她俩又一经典之作。



张鸿眉（左）孙佩莉（右）  
（拍摄于1997年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回育才工作的李乃忱



李乃忱

1946年的重庆，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山城就被地方上的反动余孽把持。育才戏剧组的老师离开得差不多了，师资缺乏。7月25日陶行知校长逝世后，正在抗敌演剧六队的原育才学校戏剧组教师李乃忱从报纸上看到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又接到育才学校寄给他的讣告，号召校友支持办校。他立即向演剧六队提出要求回育才去，得到队长刘斐章和队委会的同意后回到育才。这时的戏剧组，因为没有专业老师，而年纪较大的同学，有的到社会上的剧团参加工作去了，其他同学大约有十六七人。同时，要求进步的青少年、学校的朋友出于对陶先生的信任，不断有人把自己子弟送到育才，李才秀和陶冶就是这阶段到组里来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十二三岁，女同学占1/3。

李乃忱这次回到育才，是他从心底里难以割舍对育才学校深深的热爱，他要在这育才戏剧组这一缺师少教的困难时期担负起他之前还没完成的重任。他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工作，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他从城里买回一批新出版的夏衍著的戏剧评论集《边鼓集》，每人发一本，选出其中几篇，作为教材，重点阅读并安排讨论，如：《戏剧运动的今天与明天》

《论正规化》《人·演员·剧团》《我们在困难中行进》等，来提高同学们对从事戏剧工作的思想认识。



夏衍《边鼓集》（1944年10月美学出版社出版）

夏衍在《戏剧运动的今日与明天》中，回顾中国现代戏剧所走过的道路时认为：“‘即于现实，即于人民’，这是我们的传统”。“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新戏剧不仅在质而且在量上也已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喜爱之上获得了他长成的基础。”“熬住今日，准备明天，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的责任”。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从纷纭的戏剧发展史中概括出它的可宝贵的传统，分析了它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绘出了任重而道远的前景。

在《论正规化》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艺术观点：剧运正处于由非职业化的爱美戏剧活动转为职业化的戏剧活动的“转型期”，戏剧演出应提升到文化审美层次的高度，提出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化”的表导演队伍。在技巧训练上，应该注重对基本技术的学习，从总体上提高演出的稳定性和艺术水准。

李乃忱带领同学们时常到邻近的新华日报社去听时事报告，看苏联电影和参加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带来的秧歌舞会。（国统区的秧歌，就是通过

育才同学的公开表演，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从这些活动中，使同学们了解到国内外的斗争形势，获得不少社会知识。

戏剧组的生活、学习稳定后，李乃忱和几位大同学周竞、王万恩等合计，开始考虑演出。他们先整理一些演出过的，曾受到观众普遍欢迎的小节目，再逐步增加新的创作。但考虑到单独的戏剧组，是难有大作为的，就邀请舞蹈组和音乐组联合行动。音乐组由陈贻鑫带头，积极支持，表示愿意和戏剧组患难与共。于是两组共同拟定节目计划，投入排练，很快就组成两套晚会节目。主要内容有：

《王大娘补缸》，这是育才老师庄严大哥创作并演出的二人表演唱，曾轰动山城。原来的演员都离开了育才，这次由王万恩和刘卯钊合演，效果依然很好。

《抗战八年胜利到》，这是庄严的又一成功力作，利用陕北秧歌的形式，搞成可以在舞台或广场都能上演的大型歌舞表演，气势红火，非常动人。

组内同学新创作的节目。一个是吴振邦同学自编自演的四川鼓书《王婆骂机》，“机”是“鸡”的谐音，这里骂的“机”，是指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美帝国主义派飞机到中国来助纣为虐，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运兵、运军火还不算、还悍然轰炸解放区，使饱经日寇蹂躏的老百姓又受到新的苦难。因为他使用四川方言，文字生动有趣，表演也很活跃，很受欢迎。另一个是周竞同学编写和表演的《划龙船》，是用湖北旱船调填写，内容非常灵活，可以划到什么地方，发现什么问题，就用当地素材及时反映出来，极富战斗力，也成为主要节目。

“新疆舞”“西藏舞”，《嘉戎酒会》和“芦笙舞”。这四个短小精干，十分活泼的舞蹈节目，是舞蹈家戴爱莲先生来校时，选用戏剧组同学排练演出过的。

音乐表演和伴奏由音乐组负责。音乐组同学全体出动，各抒所长，单独表演的就有程延庆领唱《茶馆小调》，杨秉孙小提琴独奏，江秀和钢琴独奏，杜鸣心负责小合唱队的指挥，如当时流

行的《古怪歌》和他创作的《薪水是个大活宝》等。此外，还有一个精彩的弦乐四重奏，是陈贻鑫，杜鸣心，杨秉孙，程延庆四个人合作。



1945年新春，戏剧组同学表演《朱大嫂送鸡蛋》  
(表演者为胡奉文、周竞、郑昭、赵家平)

在两套节目中，每套里都有一个小话剧，一个是殷野先生利用京剧形式改写的《打面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官场的不正之风；一个是邹绿芷先生改译的独幕趣剧《退费》，说当时社会上的学生，毕业即失业，有一个学生异想天开，跑回学校，说他什么也没学到，要求校长退还他所交的学费，寓庄于谐，很有意义。这两出小戏，都由李乃忱老师导演。

节目排成，没有服装，外边有人邀请，也出不去。诗人力扬知道这一情况后，帮忙联系了一家出版社来募捐，答应先借给戏剧组一笔钱，用演出收入还给他们。戏剧组拿到钱，就请来裁缝师傅，由同学们指导，做好了服装。

首次演出，在重庆唯一的话剧剧场抗建堂，很多重庆戏剧界进步朋友，都来积极帮助搞舞美和灯光等。当时的演出，是在沉寂了将近一年的重庆舞台上，爆发出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声：反内战、要和平。两场爆满，大受欢迎。此次，除了还清借款，戏剧组有了自己的服装，就可以独立活动，接受各处邀请，公开演出了。由于节目内容精彩，雅俗共赏，而且节目的机动灵活性大，根据场地的大小，观众多少，进行节目的安排。比如有一次是到民盟主席鲜特生先生家里，演给民盟中央领导同志看，就只演《王大娘补缸》。有一次演出地点在重庆市市府礼堂，就是原国民党时期的总统

府礼堂，观众当然是以市府机关职员和家属为主，全部节目都拿上去，于是惊动了重庆市长张笃伦，他还约了李乃忱老师单独谈话。表面上，他虽未公开禁止育才演出，但后来戏剧组的两次被打，都是和他的政府分不开的。

由于戏剧组演出频繁、在广大群众中又产生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坐卧不宁，派特务跟踪演员，并两次毒打演员。

第一次是在1947年2月5日去江北演出的途中。那天，李乃忱老师正在大梁子青年会参加一次大会，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先生邀请本市各界进步的知名人士讨论应付时局的集会。正在开会时，传来同学被打的消息。李乃忱心里非常气愤，即席发言，公开向到会各界人士，宣传我们戏剧组的演出活动，抨击反动政府践踏人权，摧残民主，控诉反动派殴打学生们的罪行。随后赶回学校了解详情，见同学们都回来了，他才放心。

第二次是2月8日，戏剧组全组参加重庆市大专院校学生联合组织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宣传。按照学联的要求，组织化妆表演，选周竞和另一位高个子男同学，扮美国兵，其余同学都扮成老百姓，用麻绳捆着美国兵，游街示众。师生们敲起锣鼓，浩浩荡荡开进市区。一路上围观市民，人山人海，可以说震惊了山城，达到了宣传目的。当宣传队行进到市中区夫子池广场时，一伙流氓、特务趁拥挤之机，一阵吆喝，大打出手，一时秩序大乱，于是紧急疏散。一般同学散开就没事了，可是戏剧组同学都化了妆，穿的服装和一般人不同，平时特务跟踪，对戏剧组同学也都认识，因此，大部分同学都挨打了。而有的则被街旁商店店员趁忙乱之际拉进门去，就躲开了，等平静之后，再换衣服出来。一直到天黑，同学们

也没完全回到“管28”学校办事处。就和学联联系，知道有一部分重伤学生，被送进医院。后来，逐步查明戏剧组受重伤的除了周竞，还有一位女同学李才秀。

第二天清晨，李乃忱和陶冶同学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们。周竞虽然头上缠着纱布躺在床上，见到老师和同学，精神陡然焕发，坐了起来。他回忆昨天一场混战时还得意地说：“我也没让他们占了便宜，我看到一个特务朝我扑来，我就从身后抽出一个啤酒瓶子，照那个特务头顶打了个满脸开花。当时，他们没有料到，吓愣了。他们人多，几个人都上来打我一个……”



1946年12月在全川反美抗暴运动中，成都、重庆学生的游行队伍（川观新闻）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面临崩溃的末日，政治上黑暗到极点，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城，1947年3月1日育才学校办事处和育才本部遭国民党军警特务强行搜查，育才在重庆继续办学极其困难，学校本部被迫东迁。1947年4月开始，李乃忱老师带着戏剧组先行与音乐组、绘画组、舞蹈组四个专业组迁到上海，到“五一”，四个组师生全部平安到达上海大场赵家花园。

# 我所知道的一位老同志的陶研情结

文/颍上县陶研会 张炳岭

王光宇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安徽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人大主任。

作者近距离接触王老<sup>①</sup>是在1986年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省人大主任的王老来颍上视察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旧址（原王岗区政府），并提出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我当时对恢复甘教社的重要意义也并不十分了解。王老叙述了甘教社的历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甘教社创办于1935年，当时对于传播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做出了很大历史贡献。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实践其教育思想，在上海创办“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1935年，颍上县进步知识分子唐润之（名泽远）先生在夫人后清玉（时任颍上女子小学校长）和潘祖训（南京晓庄师范毕业生、颍上女子小学教员）倡导帮助下，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创办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颍上唐氏私立甘罗乡村教育社。唐润之亲任社长，唐子瑞为董事长。教师潘祖训，汪秋平、江曼雯夫妇都是贵池人，与后清玉同乡。他们三人都毕业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甘教社积极传播陶行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教育思想，从改造乡村私塾、小学入手，提倡“小先生”“即知即传人”的普及教育方法，开展扫盲活动。提倡“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宣传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要求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过什么职业生活就受什么教育。反对读死书、死读书。

从此开始，作者也才逐渐了解陶行知先生的

伟大，陶行知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毛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毫无保留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江泽民称他为“一代巨人”。

王光宇同志就是甘教社的第二期学员。1937年6月，教育社的第二期学员毕业，王光宇和连仲三、李兰溪随林其英老师（林与甘教社第一期教师盛震叔同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去沪参加了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从事进步活动。王光宇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时，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久奉命返乡闹革命，辗转回到王岗，在唐氏私立小学任教，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他是首任皖北中共地委书记、阜阳地委书记。1952年5月以来，他历任省委秘书长、农工部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王光宇当选为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副会长，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王光宇当选为名誉会长。1984年4月10日，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开馆典礼，王老为开馆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努力为人民服务”。

由于作者在县教育局工作，又曾任县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所以接触王老的机会较多。他

每次来颍上视察工作，都要到学校调研。当然，更多关心王岗甘罗乡村教育社的建设和发展。王老多次在颍上调研、视察过程中，我都见到他的秘书提醒他吃药。

他第一次视察甘罗乡村教育社旧址时，就指示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但要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而且要搞好甘教社的规划，逐步实施，稳扎稳打，不断提高。

1986年4月28日，省陶研会副会长、原省教育厅厅长丁丁，省陶研会秘书长王昌畴等受王老委托来颍考察教育工作，并在县教育局作《关于陶行知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报告，并到王岗参观考察了甘罗乡村教育社旧址。当年12月6日，受王老委托，省教委顾问王世杰（原省教育厅副厅长）一行参观考察了甘罗乡村教育社旧址，就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问题在王岗中学进行座谈，并形成了《座谈会议纪要》。决定由省教委拨款12万元，阜阳行署教育局拨款2万元，购地11亩，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与王岗中学合办）。教育社实行多学制长短结合，职业教育与普教相结合的办法办学。

在王老办学精神的感召下，颍上县于当年10月13日，在王岗召开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座谈会。会议号召：1. 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2. 学习陶行知不断进取的创造精神；3. 学习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4. 学陶师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5. 学习陶行知办大教育的思想，抓好普及教育。当年12月，颍上县政府转发《关于恢复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座谈纪要》，甘罗乡村教育社正式恢复。

1987年1月17日，时任省人大主任的王老冒着风雪严寒来颍上视察工作，专门听取县教育局关于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普九等工作。4月14日，县政府发了《关于成立颍上县陶行知研究会的通知》，并聘请王光宇同志为名誉理事长。王老虽为名誉理事长，但对颍上县的陶研工作极其重

视。同年9月12日，王老在颍上视察工作期间，又专门到王岗甘罗乡村教育社检查教育社恢复筹建情况，就如何落实《关于恢复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座谈纪要》和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举行座谈。

1988年7月26日，王光宇同志到颍上县视察，再次就如何办好颍上甘罗乡村教育社的问题，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共阜阳地委书记陈复东、中共颍上县委书记陈怀贵、县长张新宇、县人大主任袁国瑞、县委常委张家顺、副县长杨传文等。8月5日，县政府印发了《关于继续办好颍上甘罗乡村教育社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按照王老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社的办学指导思想、管理体制、学制、目标和任务。办学指导思想，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一办学指导思想办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基本点是一致的。恢复甘罗乡村教育社，既是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又是为了发扬优良传统，研究、探索、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二者是统一的。并决定，甘教育社与王岗中学联办，一个学校，两块牌子，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可实行“三加一”或“三加X”的学制。8月5日，聘请王光宇同志任甘罗乡村教育社名誉社长。

1990年9月4日，王老在阜阳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王岗甘罗乡村教育社。并于9月5日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了教育工作。王老先后两次作了重要讲话。由作者整理的两次讲话的内容登载在《颍上教育情况》。后被当年《行知研究》全文转载。在同期登载的还有张炳岭、唐遐龄撰写的《颍上甘罗乡村教育社今昔》，省陶研会王昌畴等撰写的《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调查报告》，颍上师范学校教师方庆和先生撰写的《试论陶行知的师德观》。本期《行知研究》几乎成了颍上县的陶研专辑。说明了在王老的亲自指导下的颍上陶研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王老在这次讲话中涉及面很广。他说教育社要办成一所综合性多学科的学校。要学晓庄师范，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学习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生活的基础来源于实践。生活教育即实践教育。陶行知有句名言，过什么生活，受什么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发展的，你们要好好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与中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是吻合的。教育社要学习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落实中央的教改精神。教育社的老师要坚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根草去”的精神，要以陶为师，教学做合一，在“做”上下功夫，教育要活，对学生要启发，不要搞注入式的教学。要教育学生“即知即传”，教育要“三个面向”，要进行素质教育。人要有点精神，不吃苦不行。生产劳动的目的在于锻炼人、培养人。学校的制度必须严格，领导必须坚持革命的作风，树立良好的校风。要有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管理。王老在学制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普通教育到一定年限实行分流，既能升学，又能就业。“三加一”也可以搞，不要搞那么死。初中以后的分流要考虑。假如普教、职教各占一半的话，工业能搞好、农业能搞好，各行各业都能搞好。学校教什么做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教什么。他还说我们职教为什么不能办呢？王岗地区，光一个“水”字就不得了。鱼鳖虾蟹都能搞，还有编织，编筐打篓。普教、职教、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特别农科教统筹很重要。

当时，颍上的学陶师陶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1991年9月18日，颍上县举行隆重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会议号召广大教师努力学习和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同日，陶行知塑像在颍上师范学校落成，并由王光宇题词。

1995年10月，王老在阜阳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等人的陪同下，又一次视察了甘罗乡村教育社，并就如何继续办好甘教社进行座谈。行署专员乔传秀当场拍板，拨款20万元用于甘教社的建校。11月24日，颍上县委、县政府发了《关于印

发〈继续办好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主要明确：1. 甘教社的办学指导思想；2. 调整甘教社的管理体制；3. 关于该校的领导问题，仍由王光宇同志任名誉社长；4. 改善甘教社的办学条件和经费供给；5. 加强教育社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建设，力争把甘教社办成全省、全国的教改和陶研基地。文件明确确定，从1996年起，甘教社列为县重点中学，由县、镇共同管理，以县管为主，与王岗中学联办。

2004年4月，颍上县陶行知研究会召开代表大会。王老虽已退休，仍担任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还介绍了陶行知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给予高度评价，要求颍上教育界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

在举办颍上甘罗乡村教育社建校70周年纪念会时，王老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捐款3万元，用于甘教社的建设。

2006年10月，阜阳市陶研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王老亲临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首先讲了各级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的历史意义。他说，1946年，陶行知在上海病逝以后，毛主席写一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他是“毫无保留的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在延安召开的追悼陶行知纪念大会上，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国二百万共产党员以陶行知为楷模，学习陶行知。1985年在北京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胡乔木代表党中央重申陶行知的伟大功绩。他说：“陶行知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称陶行知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称“大哉陶子”“二千年前孔夫子，二千年后陶行知”。这是历史的定论。王老还说，陶行知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首创了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王老还在会上，要求学陶师陶，推进素质教育。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人的要求就是，良好的道德、科学的头脑、工农的身手、艺术的趣味，

改造社会的精神。我们党提出的素质教育是培养四有新人。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真人和四有新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只有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7年10月，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六届三次年会在颍上召开。王老因病未能莅临会议，但是仍作了书面发言。当时年会的另一个主题是农村教育经验交流。王老的书面发言，紧紧围绕农村教育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本次年会把农村教育作为会议研究和探讨的中心议题，我觉得这不仅很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是陶行知先生倾其一生心血所想解决的问题。陶行知先生说：“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先生认为，一是乡村教育不发达；二是乡村教育的办学方向不适应农民子弟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当时的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造农村乡村教育的主张，丰富了中国农村教育理论。

王老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还写道，与陶行知先生当年所描述的中国乡村教育相比，中国现今农村教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

化。不仅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实行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应该说，陶先生当年所说的学校数量不足的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但是，当前农村教育有没有办学方面问题？有没有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而且在有的地区有的学校还比较严重。比如，我们的基础教育围着考试转，这是不是有方向问题？再如，农村中小学所开课程，所用教材完全和城市一样，这是否合适？等等。

在这里，王老切中当前教育的时弊，提出了当前农村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王老，1919年生于霍邱县周集。已经94岁高龄。这位髦耄老人，仍旧关心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关心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安徽省，及颍上县的陶研工作。特别是极其关心他的母校颍上甘罗乡村教育社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实验学校的甘罗乡村教育社，应该不断发展，应该有所作为。也希望县委、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给予高度重视。

#### 【注释】

[1]王老 指的是王光宇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安徽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人大主任。

#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留下的革命故事

文/胡平原



周恩来在重庆时留影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4周年纪念日，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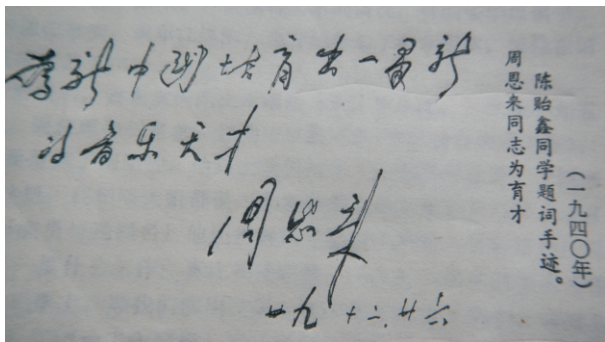
同志曾在重庆长期工作和战斗，在重庆几十个区县，只要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这里的人们都能讲上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周恩来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的故事。

## 在育才学校留下的印记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他对育才学校的师生关怀备至，对学校的工作鼎力支持。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周恩来去育才学校参观，陶行知校长专程前往北温泉迎接并陪同他来到古圣寺，一起来的还有邓颖超、徐冰等几位同志。他们在学校住了一天一夜，居住在陶校长原来在荷花池边的一排三间土墙茅屋。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来到学校参观的喜悦给了全校师生极大鼓舞，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作了意涵深刻的讲话，用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来教育师生。讲话中他说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小小年纪就能受到革命教育，因此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同学们把周恩来的教导记在本子上，记在心头。大家围着周恩来请他题词，他给每个同学题的是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他十分高兴地观看了同学们表演的节目，并和全校师生一起合影留念。晚上，老师们和每组学生代表一起在茅屋里再一次听周恩来讲，他深入浅出地为师生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投降派的指示，讲了和反动派



作斗争的方式方法，指出文艺应该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内容，音乐、绘画、戏剧、文学都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他还特别为师生介绍了大家都向往的解放区，他说：解放区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革命烈火一定会燃遍全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他还十分关怀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捐款给学校为师生添置体育设备。周恩来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正在艰苦奋斗中的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周恩来同志为育才陈贻鑫同学题词手迹

1940年12月26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音乐演奏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出席观看，参加这场演奏会的还有银行界、文化界的有关人士100余人。育才音乐组的26位同学由贺绿汀先生带领前来演出，陈贻鑫、郭惠英、刘幼雪3个同学表演钢琴弹奏，休息时陶校长在会上报告了创办育才的动机，贺绿汀报告了音乐组教学情况。在这次大会上演出的节目有齐唱、二部合唱、钢琴独奏、钢琴连弹，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应陈贻鑫同学的请求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对年轻一代寄予极大的希望。

1942年的一天，周恩来要他的秘书袁超俊到育才学校挑选一批孩子带去延安学习，袁超俊这次带走了4名同学，此后还有许多育才师生陆续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

1945年，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革命青年，为此设立了一个转送站，地址就在重庆市渝中区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里面。有一批青年去湖

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一支新四军部队，其中就有育才学生王昶新、王绍全等人。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中共南方局青委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由黎群负责，地址就在草街子回龙寺——黎群的意姐带领着育才文学组、社会科学组的五十多名同学和十多名老师，在那里学习。这样使育才师生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受到了革命的良好教育。



育才学校：抗战时期的“小解放区”

1946年春天，育才学校从草街子迁到红岩村，校舍利用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100步远的国民参政会留下的房子，大家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他和南方局的帮助和教诲。邓发、石西民、熊复、刘光等同志都先后应邀到学校作过报告，他们把当时革命的形势和斗争方向以及有关的方式方法及时告诉师生们。办事处举行周末晚会，经常邀请育才的同学们参加。1946年春节的联欢会上，育才的师生们又一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他说：“目前正在商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陶行知校长担任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师生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赞成！赞成！”

1946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南京，留下袁超俊办理遗留工作，袁超俊将办事处在红岩村的全部房屋、家具、图书，赠送给育才学校，育才的意姐代表学校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物品。

1946年，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

多，陶校长听说自己在黑名单中名列“探花”，他立即给育才师生们写信，大义凛然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人顶补。”从此陶校长更加争分夺秒地为革命工作，由于积劳成疾，劳累过度，7月25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时已由重庆去上海，闻讯之后立即赶去看望，这时陶校长已经不能讲话了，周恩来悲痛不已，紧握着陶校长的手和他告别。陶校长逝世后，延安、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发来唁电。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高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陶校长光辉的一生，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

更让人永世难忘的是，1949年的上半年，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3年，当他知道育才学校在重庆处境艰难，一直惦念着育才学校的师生，特地托专人从香港汇来800块银元，帮助育才学校师生们渡过难关。

### 在南开中学留下的足音

南开中学是张伯苓1904年在天津创办的，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南开中学上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1935年，张伯苓先生委派喻传鉴先生来重庆沙坪坝新建分校，起初校名“南渝中学”，1936年开始收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于是中学部师生迁来重庆大后方，正式改名为“南开中学”。1938年底，周恩来肩负着国家民族重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青年投入抗战洪流，曾多次来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讲演、座谈，有力地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9年1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南开中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扑鼻。上午9点

整，校门口数百名师生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应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校友会的邀请，来到南开中学，给学校师生作报告。周恩来刚从汽车里走出来，立即受到师生们的夹道欢迎，在张伯苓先生陪同下，走向学校礼堂——午晴堂，这里早已坐满了参加报告会的学生和教师。周恩来英姿焕发，健步登上讲台，一时间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张伯苓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神采奕奕站在讲台前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会场，以洪亮的声音，十分谦逊而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很多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吸引大家，引起全会场师生会心的微笑。

周恩来接着很有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引起全会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并使大家在笑声中联想到很多问题：中国革命走过长期艰险曲折的道路，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周恩来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接着说：“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语言是那样流畅，逻辑是那样严谨，以璀璨的思想光芒，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真正使师生们耳目一新。

1940年冬，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南开中学，在津南村23号楼上王端驯家中，对部分校友作了报告，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内容，分析了1940年的抗战形势，指出蒋介石控制下的重庆，反共顽固派正在分裂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例举了大量事实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分析了取得

这些胜利的主要原因：他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在敌军侧翼与后方作战灵活的战略战术。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一些亲日派、投降派，在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健儿，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却在后方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严重地影响着抗战事业，使大后方许多爱国志士和有志青年感到忧虑和烦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投降、分裂和倒退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讲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可阻挡，抗日战争的抗毒素，不仅可以消除日寇的毒焰，而且也能够清洗我国的污泥浊水。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为了在中国大陆上做垂死挣扎和援救远在南洋的孤军，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里土崩瓦解，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分和贵州的一部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补充兵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准备，利用抗日为幌子，鼓吹“十万青年从军”。周恩来针对这一形势，亲自来到南开中学，耐心细致地对张伯苓先生做了工作，揭露了蒋介石假借抗战名义，欺骗青年学生，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先生对师生们讲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此系当时国民党招募十万青年从军的口号）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南开中学挽救了师生从军去充当炮灰事件。抗战时期，由于周恩来对南开中学的深切关怀，无数次来到学校，有时单独来，有时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有时又到官井巷开校友会，给全校师生们以热情的教育和鼓励，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抗日建国的伟大斗争中去，成效昭然。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根据重庆市中等学校统一命名，改称重庆市三中。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1国后归来，路过重庆，不顾旅

途劳累，还来到南开中学视察。周总理视察的喜悦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赶来，有些年纪较小的同学，突然见到周总理激动得不知所措，周总理见到他们这种状况，便指着一位魁梧的同志亲切而风趣地问：“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同学们一看，立即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天真地喊道：“贺龙！贺龙！”周总理和贺龙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尽情地笑了。

这一天南开中学的师生特别高兴，周恩来总理也格外高兴。他像慈父般地向同学们问长问短，叮嘱大家说：“要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

最后他再三勉励学校负责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南开中学。”并鼓励同学们：“为革命而努力学好本事，勇挑革命重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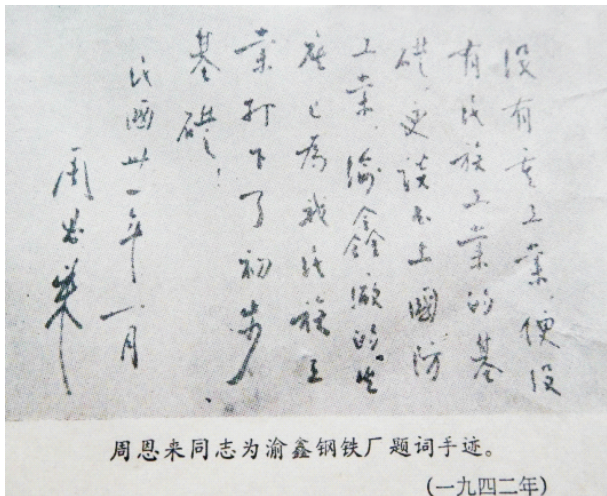
###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的题词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过许多墨宝，经重庆文化人士打造，在校园、会议室、大川、名山、江边、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形成一道文化风景线，使人们赏心悦目。抗战时期，周恩来给重庆合作五金厂和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便是一例。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之后，遵照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广泛接触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和官僚资本作斗争，巩固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影响更加广泛。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民营工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历尽艰辛，搬到后方。到1939年1月，在重庆就有五十多家内迁厂复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国民参政会为了了解内地新兴工业建设情况，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

整处，于11月25日组织了部分驻渝参政员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大公铁厂、永利铁厂、达成炼糖厂、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龙章造纸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及裕华、渝新纱厂等工厂参观。



周恩来同志为渝鑫钢铁厂题词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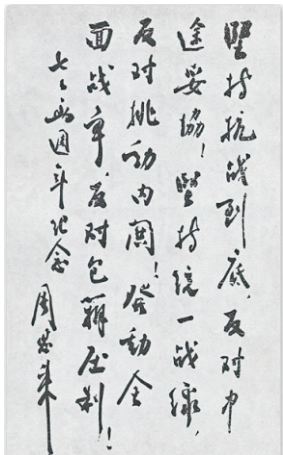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

周恩来同志为渝鑫钢铁厂题词手迹

这一次参观的参政员达五十多人，中共参政员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唐维华等同志。当他们来到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为抗战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均极力称赞。他们到各车间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技术操作，高度评价了工人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这给予工人们巨大的鼓舞。他们还热情地为该厂题了词。

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扬生产”。



1939年6月25日，周恩来为抗战两周年题词

董必武的题词是：

“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这些题词明确地为民族工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前途，给爱国的工商业者以极大的鼓励。该厂负责人胡厥文当时不在重庆，后来周恩来曾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里看望、交

谈，充分体现了他对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1939年12月至1943年，接连掀起3次反共高潮。就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一再强调和题词，争取抗战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当前和即将来临的最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一系列充满抗战必胜信念的讲话、题词、文章等，使重庆广大人民群众透过迷漫的浓雾，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2年1月14日，为了深入了解大后方民营重工业的生产情况，周恩来和冯玉祥将军一起，亲自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参观后周恩来欣然为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总理的题词，为重庆实现重工业大城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那时在四川的民营工厂中，重工业只有29家。在冶金方面稍具规模的只有中国兴业公司的钢铁厂和渝鑫钢铁厂两家。渝鑫钢铁厂是“八一三”后，由上海迁到汉口，1937年底，再由汉口迁到重庆来的。1938年7月开工到1942年1月，前后遭受到日本飞机的5次轰炸，厂房与工人宿舍先后中弹九十多枚，损失惨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该厂坚持下来，迅速复工生产。从规模来看，渝鑫仅次于中国兴业的钢铁厂，但产品却超过中兴。每月可生产灰口铁140吨，生产铸钢、竹节钢、圆钢、方钢、地轴钢等100吨左右，此外每月还可生产1720度耐高温锻炼砖（可做坩锅、冶金炉、玻璃炉窖用）1500000坯。看到厂子如此情况，周恩来在题词中，高度赞扬渝鑫钢铁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贡献。

# 周恩来过春节

文/李庆刚

周恩来过春节，虽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但它讲述了温暖和自豪的故事，留下了光荣而不朽的传奇，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 砥砺前行 的 修炼关

本是欢欢乐乐万家团圆的春节，在旧中国却被穷苦百姓称为“年关”。“年关”难过，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喜儿父女的悲剧就是旧中国穷人家庭过年的缩影。周恩来虽不是在贫苦家庭出生，但他出生后不久，家道便开始没落，母亲早亡，父亲经常外出谋生，周恩来10岁开始当家，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生活。过春节，对于周恩来来说也如过“年关”。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求学，后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离家千里，少年周恩来饱尝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1916年学校放寒假，周恩来无法回老家过年，1月31日至2月2日赶在春节前，他为新剧《仇大娘》撰写了剧本，并亲自送到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赶排。忙

这对爱国的工商业者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赞扬，使工商业者鼓足干劲，努力生产，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习总书记讲得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

完之后，2月2日除夕，茕茕孑立的周恩来倍感孤独，为转移注意力，他“取校中自治励学会新出版之杂志阅之，历三时许，全书几尽”，怀乡思亲之情又涌上心头：“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泪盈枕席夜不寐，于今读来仍辛酸。此时此刻的周恩来多么需要亲情的慰藉！在离家求学期间，周恩来把对家乡亲人的浓烈思念之情，转化成默默为公众服务的行为——“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在学生时期培养形成的急公好义、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注定了他一生风雨却始终割不断自己和朋友、社会、事业、使命千丝万缕的情愫。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邃密群科济世穷”。抵日不久，便传来叔父去世的消息。逝者

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从1938年到1946年间，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许多抗战和关爱人民的故事，如今在人们中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已矣，生者如斯。1918年2月10日是除夕，周恩来约朋友座谈聊天。他写道：“一来是为着免独居起思乡之念，二来是乘着这个机会，知交的团聚团聚。”好友三人一直聊到凌晨3点才入睡。第二天春节，几个朋友“自炊饭食，甚欢”。当天，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家中有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他在日记中立下志向：“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年关”的考验没有击倒周恩来，反而使他历经磨难修炼成熟起来。191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五），周恩来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2月8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专门致信资助自己留学的南开校董严修“遥念福体安详，精神爽健”。1923年2月17日大年初二，刚过完春节的周恩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旅欧支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几番寒暑，淬炼洗礼；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周恩来开始由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 奋斗不止的新战场

为了使亿万中国人民过上团圆幸福的春节，革命战争年代，春节成为周恩来奋斗的新战场。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开始谈判。1937年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周恩来来到古城西安，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进行了初步接触。2月11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同张冲、顾祝同等正式谈判。经过几次会谈，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

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启后，周恩来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1939年春节前后，受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1939年2月15日，周恩

来与叶挺一起从重庆乘机抵达桂林。2月16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市郊，向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共200多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号召党员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2月18日，正是农历除夕，周恩来同叶挺等离开桂林赴江西；19日春节这一天，戎马倥偬、行色匆匆的周恩来现身吉安。随后，周恩来由赣东北奔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抗战时期，周恩来常驻重庆，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他曾亲自出面，帮助陶行知先生将育才学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以保护育才师生的安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节，周恩来特邀育才学校师生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过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希望育才学校师生“要像陶行知先生号召的那样，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并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准备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中共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担任民主政府的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呀？”话音刚落，场上顿时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结合后总是聚少离多，即便是春节这一天两人也常常不得相聚。1948年春节前后，周恩来转战陕北，邓颖超则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工作。其间，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一方面嘘寒问暖，另一方面听取他对于土改相关问题的意见。接信后，周恩来两次给邓颖超回信，其中的一次就在2月9日除夕这一天。在信中，周恩来除了表达思念殷殷的深情之外，用很大的篇幅，帮助邓颖超分析如何理解党的土地政策，直至如何具体做好工作。最后，周恩来对邓颖超遥祝“年好！”这对革命伴侣就这样在相互支持、相互遥祝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春节。

### 奔波忙碌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管外交。春节前后，他常常奔波于五湖四海，广交朋友，为新

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随后，周恩来也奔赴莫斯科，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于1950年2月14日同苏联方面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除夕，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2月17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起草和毛泽东联名致刘少奇的电报，就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出答复。晚上6点，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并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周恩来同毛泽东登上专列回国，进入国境时已是10天后的2月26日即正月初十了。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国，其间恰逢春节。根据党中央建议，周恩来率代表团回到昆明，节后继续访问。在成都期间，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参观杜甫草堂，他亲自查点人数，要警卫员统一买票入园。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出访亚、非、欧14国）报告提纲。”1964年2月14日，大年初二，应缅甸奈温主席的邀请，周恩来访问缅甸。周恩来和奈温已经是老朋友了，4年前1960年，仍然是春节期间，奈温来华商讨两国边界问题。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除夕，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行。1月28日春节，周恩来与奈温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于边界

问题的协定上签字，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时过4年，这次周恩来春节期间的访缅也获得圆满成功。

春节还是周恩来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时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第一次是1954年的除夕，团拜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来到后台慰问，和在场的演员开起了座谈会，内容包括北京人艺的方方面面。如男女演员的比例失调问题、工资及住房问题，甚至还有剧场有多少座位、一场演出能卖多少钱、演出收入怎么分配，等等。

每年春节，周恩来因忙于公务国事，很少有闲暇时间，但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尽量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亲属都叫来，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过年，他记得很清楚：大年三十，周恩来把在京的亲属、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请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连大人带孩子，熙熙攘攘地把西花厅挤得满满的。春节期间也是周恩来对晚辈进行家风家教的时候，这一次依然如此。他在对周保章的谈话中说：“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这一句教诲和嘱咐，周保章铭记于心，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默默无闻在基层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积极奉献。时至今日，周恩来的晚辈都牢记他的教导：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是周恩来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原载《学习时报》

# 难忘的岁月

## ——悼隆侃

文/文履平

1944年秋天，我们几个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学习的同学，认识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够，需要在课外再组织一个学习小组来加强学习。我们把这个意思和组主任力杨先生商量，他很赞成，于是推荐社会组新来的一个教员作辅导。

这个辅导教员就是隆侃，他和力杨先生同住在一间屋子。二十多岁，戴一副大框子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袍，人很清瘦，显得落拓。他很快就和我们谈得来了，一同学习书本，一起围拢来讨论，许多时候无拘无束地谈得十分热烈。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和向往。

那个时候，我们读的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这样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能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其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看到不无讽刺意味的文句，延安也有一些十八九岁的娃娃还在学习《反杜林论》，不禁两颊发热。虽然学而不通，但热情确实是有的，而且对革命的追求还很执着。

1945年夏天，我因为学校放暑假，回到家里去。一天，偶然在街头和他迎面相碰了。他很惊喜。

原来，他是组织上派来这个县做开辟工作的，人生地不熟，工作一时难以进行。他想到我和向洛新都是本地人，有许多便利条件，所以一来就急于找到我们，但又苦无详细地址，只得满街乱窜，果然事有遇缘。

接下来就是他说服我，要我留下来和他一同工作。开始我是很不愿意的，而且态度还很坚决。

因为我的头脑里，对革命工作还想象得很浪漫，总想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战场上持枪对敌。

但是他却锲而不舍，一再拉着我申说，硬是要我留下来。后来，我让了一步，答应把在本地的几个有进步倾向，而为人又很可靠的朋友介绍给他，帮助他开展工作。

殊不知这却把我也拴上了。于是我带他一同去找这几个朋友，逐渐这几个朋友被鼓动起来。我并非一个旁观者，岂不受到感染，终于被说服了，自愿在这里工作。

秋季开学后，我仍然回到学校，把情况向党支部书记、社会组主任廖意林汇报了。她表示默许。我又在社会组、文学组的同学中，分头做了一些组织和发动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洛新和我，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一同去到那个县里去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所以隆侃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这年秋天，由于客观环境的演变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又一同调到重庆来了，也逐步形成在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下的一级组织，仍然是负担青年工作。但是分配我的社会职业，却是到一家民间报社去做编辑。起初我又不愿去的。隆侃说服我，说这不是单纯的文化工作，而是一面编报一面参加群众运动，编报纸是占领一块阵地，学习业务是在实际中锻炼和提高。于是我接受了，虽然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

第二年春天，国民党当局宣布《新华日报》停刊，停止中共四川省委的活动，接着又把公开的人员全部用飞机运回延安。事情来得突然，我



们思想上没有准备，难免震惊和惶惑，而且上级联系也已中断。但是，很快我们就镇定下来，继续开展工作。作为领头人，隆侃独立自主地做了大量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和妥善安排，把我们团结在他的周围，接受他的指挥。如果不是他的从容镇定，处变不惊，我们这一部分人马可能也已五零四散了。

然而，更为难得的是他积极主动，开拓进取的精神。在隆侃的提议筹划和做了周密准备之后，我们在缺少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争取多方配合，办起了地下油印刊物《反攻》，此时又陆续知道和看到了同为地下油印刊物的《挺进报》和《突击报》。这使我们感觉到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周围还有友军，都在寻找党的组织，争取得到领导。其实川东地下党也在积极寻找我们，原来由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直接领导的这一部分人，以便建立组织关系，重新部署工作。经过互相辗转寻找，终于得到解决。不过这已经是秋冬季节了。隆侃来向我传达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窗外满布着低沉的冻云，他的脸色却是极其少有的开朗。他很兴奋地告诉我，重庆市委已正式承认我们的《反攻》为机关刊物，还需要我们继续办下去。

凝聚在心底的阴霾已一扫而空，我们欣悦地奋力工作，同时解决组织问题。我还参加一部分公开发行的《中国学生导报》的编辑工作，工作量增加了，日以继夜地干。

《反攻》又编印出了一期或两期，我已记不准确了。隆侃又来郑重地向我传达，市委决定停出《反攻》，加强《挺进报》，我们这个组织的，另行组成一个专搞学运的支部，但却要在我们中间选择适当的人去充实《挺进报》，而这合适的人选就是我。我的心又沉重起来。

他早已料到我不情愿，就开导我：“从工作上考虑，你的业务能力和各种条件都很合适，是能够适应的人，而且党所需要的是各种人才，任何一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你的气质更宜于做文化工作。”老实说，我是不愿离开熟悉的工作部门而去接触完全陌生的人和事的，我一直沉默着，他也不再说更多的话，只是临走轻啜了一声。

又过了些日子，意姐（即廖意林，我们都这样称呼她）突然到我这里来了，我原来并不知道是她在领导我们这个小组。她通知我，我的组织关系已转到《挺进报》支部，以后就由他们来人接头。组织上对我的安排是，准备租一栋房子，办一个表面灰色的书店，要我去当老板，再配一两个店员，以后报纸的编印都在这里，发行由别的同志负责。谈到这里她笑了：要你去当老板有没有意见？我只得苦笑了一笑。她注视我一会，平静地说，没有意见就好。听说你还有点情绪是吧？我只得赶快摇头。她站起来走了，又严肃地叮嘱了几句：既然是党员，就要按照党的要求办事。首先是服从组织分配，还要安心工作，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把她送出报社大门，她还不放心地转过来叮嘱：陌生的人也是同志，都是自己人。一个人哪能一辈子都是只和老熟人在一起。你也不再是孩子了，要有个大人的样子，记住。我很感激意姐，我知道这也是隆侃的苦心。

不久，蒋一苇同志来和我接头，正式传达我已是《挺进报》支部的成员，具体工作尚待分配。谁料正在我做好思想准备，以便接受新任务的时候，突然，蒋一苇同志又事先不经任何联系，就直接闯到我住的地方来。他匆促地通知我，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必须立即转移，我也必须马上离开。他留了一个接头暗号给我。临走的时候他又对我说，如果我还找得到原来的组织，可以直接去和他们接上关系，不必坐等。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我只得再去找隆侃，把经过给他说了，他告诉我，问题十分严重，可以说是我们被敌人抓住了要害！市委有很重要的人物“进去了”（即被捕），而且有叛变的迹象，现在叛徒和特务在到处抓人，必须立即抢救组织，有秩序地安排人员撤退。他作了多种考虑之后，决定我暂时回家乡去，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以后由他负责联系。

我在离县城40里外的乡间，一个同志家里，以养病为名住下来，直到七八月间，隆侃孤身一人，找到我，由他谈起，我才知道发生在重庆的严重情况，我很佩服他的那种处变不惊，从容镇静，指挥若定的精神和本领。这些日子，重庆的

地下组织几乎破坏殆尽，而他所负责领导的这个部门，不但没有遭受破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这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我所住的这个地方，那些日子正在准备发动农民武装，参加华蓥山起义。如果我主动提出要求，当地同志是会同意让我参加的。不过我想先把组织关系接上再说。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隆侃，他认真思考后说，参加起义当然可以，不过以我的条件，去了一时也无文字工作可做。而且一不会跑路，二不能打枪，还是一介书生，高度近视。不但适应不了战斗频繁、不断转移的环境，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的拖累。与其这样，不如另行安排一个适合自身条件的工作为是。

隆侃转回重庆不久，就写信给我，说是工作已经安排就绪，调我到重庆来。这样我就带上一个三人党小组，到离江津县城百多里外的一个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年底我又调回重庆，党小组则移交给当地组织接收和分配。

这期间，隆侃单独飞到香港，通过间接关系，辗转找到党的上级组织，接上关系，转来又把川东党组织的关系接通了。这是他主动独立作出的决断，应该说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是功不可没的。

这样，我更为信服隆侃，也为能重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庆幸。但是，却不过多久，他又奉调到解放区去了。

重庆解放后，隆侃又随军回来。这时，我已转到另外一个系统工作。除了初次再见，还庆幸过劫后重聚，实际上，以后相聚是很难得的，因为各自都有份内的工作。忙，实在是很忙，哪得更多的余闲。偶然见面也只是普通的寒暄，甚或简单地地点点头又擦身而过。

遭逢一场劫难以后，又是百废俱兴的日子，我从流放地回来，开始的时候工作不算很多，空时也出去看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话一话旧。见到隆侃，一个直觉的印象是他老了，头上已有白发，身形也很瘦削，不过精神还好，谈锋甚健，某些见解不改当年。对于逐渐时兴起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十分荒诞的所谓“新潮”思想，谈起多不以为然，甚至以为隐忧。觉得一任泛滥，惑乱的将不仅是人的思想，严重的将引起破坏，事实表明这些并非过虑。

劫后重聚，散处各地的“陶门弟子”，都有重新评价陶行知先生和发起研究生生活教育理论的要求，作为当年亲身受过教诲的人，我们觉得这是义不容辞，也就自发地行动起来。于是集会、写文章，商量进行步骤，但这项工作起初并不得到承认，这时候，隆侃比我们成熟得多，仍然挺身而出，不减当年的豪情，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和风险。终于突破初起时的艰难，而逐渐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并得到有关各方的支持和赞许。

去年春天，为了一个刊物的事情，隆侃又上门来找我。这是党办的刊物，又是他在负担一部分责任，虽然我也不一定挤得出来多少时间，但无论公谊私情，都不容许推卸，于是也就承揽下来。一年多来，我做的事情实在十分微薄，而有的还是在他的指导和督率下方才勉力而为的。相形之下，他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都为我所远远不及。他还准备要做更多的事情，至少我知道有几篇文章正在酝酿腹稿。可惜这些都未能完成……

隆侃既是我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更是我的良师益友，思念是未有穷期的。我当学习他执着追求，勇于任事，无私无畏，甘当风险，积极进取，工作，向前，直至生命的终止。

原载《挺进报》

# 问得花儿朵朵开

文/安徽省芜湖市陶研会 戴建新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我们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幼儿的言语教学中，更应在“问”上多动脑筋，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激发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引导幼儿进入语言学习的情境，产生学习语言的兴趣，从而热爱语言学习，促进幼儿思维的健康发展。

## 一、在故事的角色上巧设问

幼儿都喜欢听故事，一个个优美的童话故事在孩子们眼前展开了旖旎奇幻的世界。这时，我们教师就应该抓住故事中有利于幼儿想象的因素提出问题。提问要有创意，具有开放性，能激励幼儿产生联想、展开想象，进行创造，使他们能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途径来探索问题的多种可能性。教师可以尝试以角色的身份设问，为幼儿营造故事的情景氛围，引导孩子们一下子就投入到故事的情境之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如在故事《会爆炸的苹果》的教学中，就可以在讲述前段故事的基础上，以狐狸的口气设问：“我是小狐狸，小猪的苹果又大又红，我该想个什么办法才能吃到小猪的大苹果？”这样，教师便可以引导孩子们以角色的身份投入到故事的情境和氛围之中，想象狐狸以“红气球”来骗小猪的故事情节。

## 二、在故事的情节中插入问

教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中断讲解，插入设问，激励孩子们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对故事做适当的想象、创编和讲述。孩子们可以依据故事中角色的行为，调动生活经验，思考故事的内涵、人物的心理活动等，在创造性的想象空间中将思维引向深入。仍以讲故事《会爆炸的苹果》为例。当讲述到“狐狸以红气球充当新品种的大苹果来跟小猪换苹果”的时候，教师就可以中断故事的讲述，进行设问：“小猪会上当吗？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谁来帮帮小猪？”引导幼儿想办法，给小猪以帮助。并从苹果的形、色、味等方面入手，采用比一比、闻一闻、摸一摸等方法揭穿狐狸的鬼把戏，创编讲述新的故事内容。

## 三、在故事进行中换位问

教师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适时提出问题，启发幼儿把自己假想成故事中的角色，能够引导幼儿把自己想象成作品中的人物，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去体验角色的行为和心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出较为合理的假想情节，在满足幼儿好模仿的心理的基础上，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如在故事《门铃响了》的教学中，当每人只有一块甜饼的时候，门铃又响了，沙沙要不要去开门呢？面对这一个两难的问题，教师可以提问：“如果你是沙沙，你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从而引导孩子从沙沙的角度思考与想象，作出分析与判断。

#### 四、在故事的联系上开放问

我们还可以根据故事中事物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设问，使孩子从事物的不同侧面去了解事物，开阔思路，形成多种答案，并在一定程度上增添活动的情趣，激活孩子们的情感与思维。如在散文诗《小草的梦》教学中，让孩子们想想说说“小草的梦除了是绿绿的，还会是怎样的？小花的梦呢？还有谁也爱做梦？他的梦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系列的开放式的提问，会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展开想象，做出各种不同的回答，从而使幼儿的发散思维能力得到培养。另外，有些判断性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也有利于孩子们进行判断、想象和推理，例如“你喜欢……为什么？”“如果……你会用什么办法？”这些问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健康发展与提高。

我们还要注意，提问必须要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要使问题对幼儿形成一定的挑战性。在一个教学活动整体中，可以按照由教师创设问题情境（提出问题）→幼儿思考回答→教师倾听、判断并给予回应或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幼儿再思考回答的步骤来进行，要使提问抓住重点，形成一

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让语言教育活动成为师幼双方积极互动的过程。

实际上，仅有精心设计的提问还不够，因为这只是课前预设，关键还在于课中生成，幼儿语言教学的组织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能够根据幼儿具体的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教师应在调动全体幼儿集中注意力后紧接着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使全体幼儿都能认真思考。不同难易程度的问题要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孩子来回答。教师提出问题后，要注意运用恰当的表情来“反馈”幼儿的回答，鼓励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进行总结评价时，应注意否定时不应全盘否定，而要注意给幼儿以适当的鼓励。肯定和表扬时，则要注意启发幼儿进一步思考。

一个有效的“好问题”，可以使幼儿的语言学习既有趣味又亲和高效，而什么问题“好问题”却又没有固定的标准和答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教师要根据特定的课堂教学情境，巧妙设问。只要我们教师真正用心去寻机设问，加以得当启发诱导，就一定能在幼儿的语言教学中，问得花儿朵朵开。

2021年9月22日

# 初中语文密码教学法初探

文/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育才学校 胡川

**【摘要】**语文课程强调语文学科的综合性，要沟通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恰当地运用数字、字母、符号等组成教学密码，构建教学主问题组织语文教学，不仅能激起学生探究欲望，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让思维活跃、课堂活跃，而且能帮助学生主动建构学习，锤炼学生的思维，有效地突破和掌握重点、难点，提高对信息的搜集、概括、整合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主动探究、主动发现、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创新创造意识。

**【关键词】**密码教学；汉字密码；数字密码；符号密码；综合密码

## 一、提出背景

1.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应拓宽语文学习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

2. 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催生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双创”战略实施的关键是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双创”型人才。“双创”型人才的培养要靠创新教育，创新教育要从小学抓起。

据心理学家分析：知难而进的行为其实是人性深处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龄段以及阶级。热衷于未知事物的冒险、刺激与探秘是人类的一笔生物学遗产。在人类的繁衍中，人类会不断寻求新的未知、新的刺激，“追求震撼”。

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因过分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快速获得，让初中语文课堂缺少活力与激

情，语文课程的僵硬、枯燥和孤立。老师课文讲细，讲透，讲全面；学生（尤其是差生）大都在懵晕之中度过课堂40分钟。师生都在黑暗中憋闷里苦苦挣扎。初中语文教学，必须引入源头活水，必须要有创新创造的思想做法，而语文“密码教学”是其中一种妙用。

## 二、密码教学

### （一）教学意义

所谓语文密码教学，即将数字、字母、汉字、符号等在语文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与文本紧密结合，设计成教学密码，建构教学的主问题，然后组织学生把密码破译当作学习任务的教学方式。密码教学不仅能让教学内容删繁就简，直指核心价值，其探究求知过程的刺激性可以激起学生主动探究、深层次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对信息的搜集、概括、整合、运用的能力，从而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教学理念。解码的不断成功，必将在心理上不断刺激学生更大更强烈的学

习兴趣和愿望，产生不竭的动力，影响学生的认知结构、学习方式，从而培养学生创新创造的意识。

## （二）汉字密码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凡课文具有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形象各异、手法独特、主题潜蕴性等特点，特别适合设置汉字密码，让学生探究性阅读，培养学生阅读的感受力、理解力、欣赏力、评价力和创造力。

比如，我们教学《孙权劝学》一文，如果教师这样教学：“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创作的一篇记叙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学生大多会面无表情。但是，笔者采用密码教学法，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这篇课文可是有密码的，这个密码就是一个‘善’字，谁能解开密码，说明理由，谁就率先完成了今天的学习任务！”堂下学生们一脸好奇，从独自沉思到窃窃私语，继而在课文中引经据典，脸红耳赤地唇枪舌战起来，课堂呈现出了沸点。最后，大家归结为，这篇课文一共有四“善”：孙权善劝，吕蒙善学，鲁肃善赞，司马光善写。教学由“四善”的内容延伸，一线串珠，自然流畅。教学结束时，学生兴奋地说：so easy!

在后面的教学中，我运用此法让学生为《皇帝的新装》《故乡》《老王》等课文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设置汉字密码，他们分别设成了：“骗”“变”“苦”。同学们在解码过程中，思维相荡相击，涟漪生而火星发，课堂高潮迭起，教学实现了魅力化和高效化。

## （三）数字密码

如果教学要点较多，涉及的知识面广，“数字密码”就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能够让同学增加体验的深度，记忆的长度，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陋室铭》教学时，我将数字密码“2、3”呈现出来，2分钟的静寂后，课堂立刻被引爆了：“2处起兴”“虚实2种写法”“古代2个人物”“2座建筑”“2种人物品质”“3个方面描写”……同学们一脸兴奋，捡了宝似的。

《周亚夫军细柳》教学时，为了让学生有效掌握其亮点，突出重点、难点，我把数字密码设置为“1、3、4”，分别对应一种独特的写法、三类人物、四处对比，学生弄清楚数字密码“1、3、4”的含义之后，课文的写法、形象等亮点掌握也就到位了。

## （四）字母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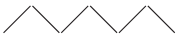
有时候，字母也能作为教学密码，以其别具一格的魅力，调动起学生的求知探究欲望。

新闻写作中的六个“W”，是一般新闻工作者都知道的一个常识问题。它们是：what、who、when、where、why、how译成汉语就是：何事、何人、何时、何地、为何、如何，总起来说就是六个“何”。我在教学八上第一单元新闻单元时，将这六个“W”密码抛出来，作为新闻教学的切入点，既方便了同学的理解、掌握和记忆，阅读理解、写作表达的能力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人教版八上语文第四单元中，有不少老师认为《孟子三章》是最不好教学的了，因为在这之前，学生并没有论说文的相关知识储备。但是我利用字母密码来建构教学，却收到了四两拨千斤、举一反三的效果。上课伊始，我首先写出字母密码：“孟子SB”，学生一阵哄堂大笑，我当然知道他们笑什么。然后我继续说：SB，就是“善辩”的首写字母。学生又一阵“哦~”。我又继续：SB=善辩=善比=三比。孟子说理论辩的厉害，就体现在“善比”“三比”的艺术中，谁能用课文中的例子来解码？学生齐声“哇！”之后，马上进入文本的比喻、类比、对比、排比说理的分析之中了。

## （五）符号密码

符号因其具有特殊的直观性、形象性，作为

教学密码使用，也能发挥独到的妙用。如“！”既像流下的眼泪，又像一个催人奋进的鼓槌。符号“^\_^”代表着笑脸。为了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心理变化，在教学《社戏》和《我的叔叔于勒》时，我先给出符号密码：心电图, 要求学生小组合作，在波谷和波峰上填写相应的课文内容来解码，学生兴致盎然，很快就进入了文本的细读体悟之中了。在《老山界》一文的教学过程中，我也给出了一个“^”（山）形符号密码，要求根据课文内容在符号不同的位置标注上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后面文章取材、详略的教学，就依靠此图，水到渠成了。

#### （六）综合密码

有些时候，汉字、数字、字母、符号等，可以结合起来，表达复杂的意思，解决语文教学的棘手问题。

在《背影》的教学中，为了达到读写双轨运行的目的，笔者这样设计教学：“同学们，《背影》情感的密码为“5说”，“5说”表现出来的情感最为动人，请大家深入阅读课文，解码分别是哪“5说”？学生们跃跃欲试，课堂渐趋沸腾……最后，经过一番争论，学生们一致认为“情感5说”即：伤痛说、矛盾说、心细说、危险说、艰难说。写作中，运用好了其中一种或几种，写出来的文章必然生动感人。在这里，听说读写思结合，百花齐放，阅读写作能力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

### 三、注意事项

密码教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在我们面前，深受学生的喜爱，但密码教学也不是万能的，有很多注意的地方，不然会弄巧成拙。

1. 要教给学生设置密码的一般规则或范围，这个规则或范围就是语文核心的知识技能点，有关阅读和写作的核心要素，多从文本的线索、内容、情节、形象、写法、主旨等方面入手。否则，漫无边际，学生无从着手。

2. 设置密码不能过长过复杂，密码超过5位，符号有三种以上，一般不考虑，否则密码过难，

浪费时间，要点不突出，教学得不偿失。

3. 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只是由老师出密码，学生只能被动地解码。在教学适当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设置密码，学生相互自行解码。如：你也来给《孔乙己》设一个数字密码，并说说设计的原因。

### 四、结语

密码教学法，形式多样，竭尽了师生智慧的挑逗。“密码教学”，把信息、英语、数学、心理等其他学科与语文学科很好地结合起来，沟通了语文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体现了学科的跨界整合，语文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改变了学生语文学习的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当然，“密码教学”的形式远远不止于上面所述，只要我们在教学中潜心钻研，一定还能发现更多的妙用，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魅力、效益。

#### 【参考文献】

- [1] 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
- [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R].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5(18):5-10.
- [3] 巢宗祺. 《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4] 王永先. 《论语文教学和各学科的关系》[J]. 语文学刊, 2009(5).
- [5] 王芸. 《数字密码——语文老师教学的法宝》[J]. 科技信息, 2011(22).

# 雾里看花，花非花

## ——浅谈初中语文外国诗歌教学中的对话教学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陶宣

**【摘要】** 长期以来的语文教学中，对古典诗词宠爱有加，而外国诗歌的教学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论文探讨了中学语文外国诗歌教学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法，使教学不再是雾里看花，因为雾里看花毕竟是模糊的，而应该更着力于对话教学，即对作者的情感体验的关注，加强诗歌中意象的联系，加深诗歌中意境的营造，狠抓了诗中意蕴的探究，从而突出诗歌审美性的特点。

**【关键词】** 外国诗歌；对话教学；对策研究

诗歌是人类语言文化的优秀结晶，反映着各国不同的语言文化特色、文学传统、审美情趣。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选了一些外国诗歌<sup>[1]</sup>，但对很多学生而言，在理解、背诵、欣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是由于语言差异、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在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对学生加以引导，使之逐渐融合，真正达到语文教学的目的。

### 一、诗歌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宋词是古典诗歌中的精品，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现代诗歌中的力作唱和着时代变迁的节律，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孔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诠释了诗歌的魅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道出了诗歌的功用和价值。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

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而现代的诗歌教学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外国诗歌的教学，让许多学生头昏，许多老师头痛。初中语文是语文学习的关键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如果学生失去兴趣，就会对以后高中语文的学习造成影响，所以，此时，如何研究初中语文外国诗歌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的外国诗歌作品占了将近十分之一，可见外国诗歌教学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诗歌的审美化教学有助于达到诗教的目的，培养具有现代文明素养和创造能力的人。具体到一首诗的教学中来，就是要让学生体验到诗的精华所在，美的所在，旨趣所在。所有的教学手段都统一到在上面来，就会出现和谐的课堂氛围。”

### 二、诗歌教学的特殊性

有的教师认为，外国诗歌就是中国新诗<sup>[2]</sup>。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它毕竟是外国人的作品，而新诗是在继承发扬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



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诗歌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具有形式自由、韵律灵活、自然清新的特点。新诗采用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诗家语”），它高度凝练，大幅跳跃，富有暗示性。而大多数外国诗歌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

诗歌是含蓄的艺术。外国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韵律美的语言、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具有节奏美、韵律美、语言美、意境美的特质。阅读一定数量的诗歌，不仅可以怡情养性、陶冶身心，还有助于拓宽视野、丰富语汇、提升素养，锻造能力。所以诗歌的特殊性就对我们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中要有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教学方式。

### 三、对话教学的重要运用

“教师要成为课堂对话的首席（语文课程标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告诉我们，理解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关键要素。因此，只有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构建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关系平台<sup>[3]</sup>。

我们在进行诗歌教学时，要重点抓“读”，通过吟诵和唱的方式，把重点诗歌（见上表标\*号的诗歌）读熟背熟，并识记一部分重点诗歌的相关内容；关键抓“悟”，领悟诗歌意境，了解诗歌大意，把握诗歌技法，品析作品语言；着眼点是“创”，用斟字酌句、联“（主）旨”扣“境（意境、语境）”的方式揣摩重点诗句的内涵，用比较分析法品味诗歌语言特色及内涵，用仿写、改写、扩写等方式再造诗歌意境或形象，培养学生创意理解和创意表达能力。

下面以《外国诗两首》教学片段为例，加以阐释。

#### （一）提供对话教学的基础。

诗歌贵形象思维，且讲究含蓄。当诗人描绘

事物时，他的目的往往不在于说这事物怎样，而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写景则是借景抒情，咏物则是借物言志。而这些形象也好，情感也好，无不依赖于诗歌语言的表述。因此，在进行诗歌教学时切不可从“抽象”再次走向“抽象”。教师可以充分运用表情与动作的感染；教师板画的直观；录音配乐、CAI课件的使用……化“抽象”为“形象”。让学生对审美对象从直接感知开始，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 （二）创设对话教学的氛围。

我们更要运用一切可行手段，如借助物像、借助画面、借助音乐、借助美术、借助移情等，从而丰富学生的审美感知，使学生对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深刻的领悟和启迪，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染上作者的情绪色调。所以我们进行诗歌教学时，要充分挖掘诗歌本身的美感，让学生感到，即使是“枯燥的哲理”，也是美的，美就能够接受。方能使整个诗歌教学过程笼罩在师生所创造的特定的气氛和情调中，使学生在和谐、热情、活泼、充满美感的课堂氛围中感知美、欣赏美。

#### （三）拓展对话教学的视野。

教师还应当善于引导学生在赏析诗歌语言的基础上拓展对话教学的视野。如在诗意拓展环节，教师的两个问题“同学们，假如你就是一名黑人，你将还会用什么来见证你的历史？假如你就是世界的著名河流，你将会对黑人说些什么？”是对诗歌内涵理解基础上的一个延伸，实践证明：这个拓展很有必要，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的时空，搭建了对话教学的渠道，拓展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诗歌教学灵活多变，不同教师，不同学校，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教育，语文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语文素质是其他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它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诗歌教学是语文教育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将对素质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结合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诗歌教学的现状，打破僵化的教学

# 开学典礼 | 行知育才：青春正当时，一起向未来！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新年伊始，立春之日，第二十四届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万众瞩目下，拉开序幕。中国人民用“最人民”的方式讲述着“最中国”的故事，向世界展示出“正青春”的姿态。

今日，一场关于“奥林匹克”、关于“青春中国”、关于“我辈未来”的开学第一课也正式上线育才校园！

值此开学之际，重庆育才中学张和松校长也为小陶子送去殷殷寄语，他希望各位学子：一是涵养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做矢志报国者；二是秉持求知定力与创新精神，做时代开拓者；三是保持健康心性和实干精神，做人生奋进者。努力成长为一名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青年！



张和松校长致辞

方法，继承传统，积极开拓，在诗歌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素质是语文诗歌教学的潜在目标，而且也将作为语文教师的终身目标。

## 篇章一 中国正青春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时隔1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又一次进入“北京时间”，北京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

14年上下求索，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叙述主体从“我”变成了“我们”，叙事逻辑从“讲历史”到“向未来”，中国不仅仅在世界上有了质的飞跃，其华夏精神更是深深地扎进了地球的土壤。

《双奥逢盛世，一起向未来》，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



主题故事分享《双奥逢盛世，一起向未来》  
(分享者：文义支、白镜佑)

## 【参考文献】

- [1] 语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三版.
- [2] 杨东曾: 初中语文现代诗歌的问题及对策[M], 教学月刊中学版, 2004. 18-1.
- [3] 李广祺: 浅谈初中语文外国诗歌教学[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5).

百余年前，奥运三问刻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能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今日“奥运三问”得到解答，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加冕，多少次披星戴月，多少回攻坚克难，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一抹中国红！

2008年，我们敞开国门，高歌《北京欢迎你》，用震撼人心的表演，送出了泱泱华夏的名片；

2022年，我们重逢奥运，在澄澈童声演唱的《国际歌》中，用简约至美的设计，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形象。

从“我”变成了“我们”，视野不再局限，从“讲历史”到“向未来”，文化更自信。14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向世界解释“我是谁”了。中国俨然从一个渴求关注的孩童，成为了沉稳大气、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

“燕山雪花大如席”全世界不同的雪花汇聚北京，成为一朵人类的共同雪花。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将穿透依旧笼罩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阴云，照亮人类团结合作、共赴时艰的前路，点燃属于全人类的希望之火。

命运置我于深谷，我便绝地反击，奋斗出一个逆境中的奇迹，“冲刺之王”武大靖带领国家速滑队拿下首金，用实力诠释中国速度，用决胜彰显大国形象。

玉汝于成，踏雪寻龙。雪道之上，自由飞翔。谷爱凌成功完成两周空翻转体1440度的动作，成为世界上首位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一动作的女运动员。她朝着自己的理想不停奔赴着，热爱与坚持让她荣誉卫冕！

17岁苏翊鸣，驰骋冰雪赛场，仿若雪上少侠，飘逸自如；22岁任子威，身披国旗，宛若红色闪电，一骑绝尘；24岁金博洋，一曲《卧虎藏龙》，化身雪上精灵，灵动飘逸。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他们正青春，必将永远年轻着，致敬青春的力量。

从2008到2022，从鸟巢到国家速滑馆，李久林重逢奥运，用工程美学为短道速滑保驾护航；

从2008到2022，从看客到建设者，宋加峰重逢奥运，用制冰绝技雕琢完美冰丝带；从2008到2022，从北京再到北京，张艺谋重逢奥运，用中国式美学诠释中国的冬奥浪漫。

一个国家的伟大，不仅在于一个领导人的伟大，更在于千千万万个平凡而不平凡的小我之伟大，是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长，为北京冬奥会保驾护航。

清澈的爱，只为心中的国，温热的泪，洒向脚下的土。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各司其职，各尽所长，才有了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永远热泪盈眶，致敬青春的力量！

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正青春，中国正青春。

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百年奋斗，舍我其谁！

让我们共同奔赴下一个百年！

## 篇章二 育才正青春

冬奥盛会，是促进交流、增进友谊的桥梁与纽带。每次奥运会都有这样一个志愿群体，他们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用无微不至的服务传递着友爱与团结，温暖着这个冰雪的北京。

而在这些志愿者中，也有从育才走出去的优秀少年们的身影，他们在冬奥的幕后担起一份份责任，奔赴一场场热爱，展示着青春力量，彰显出大国风范。

《育才之根，青年之魂》，现在让我们共同一睹育才青年的风采！



主题故事分享《育才之根，青年之魂》  
(分享者：赵彦鹏、孙一佩婕、王鑫)

大家好，我是校团委学生会学生副书记孙一佩婕。图片上是我们的学姐，重庆育才中学高2018届毕业生冯禧，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去年的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千人齐声献词，她也光荣地成为了10名预备领诵员当中的一员。经过成百上千次的体态站姿、摆臂幅度、朗诵技巧的训练，虽然冯禧学姐在活动开始前的最后一刻被告知自动改编为一名普通献词成员，不能站上献词的最前排，但她知道，大家不分主力替补，只有“我们”。无论是谁，都代表了10人、1000人、以及全体青年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向祖国母亲、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深情表白。

育才之根，青年之魂。冯禧立志用“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发出中国青年的时代最强音，用青春之热血浇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家好，我是校团委学生会副主席王鑫。屏幕上的是我们的学长，重庆育才中学高2018届毕业生姜宇昕，现已研究生保送至北京大学法学院。除了是一名准研究生，姜宇昕学长还是目前正在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即将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大学期间，他先后参加了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国博讲解活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2021年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志愿服务。祖国的每一个重大时刻都让姜宇昕学长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民族紧密相连。强烈的使命感告诉他：“恰逢其时，就要应召而上！”

育才之根，青年之魂。姜宇昕学长立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青年的奉献精神，将燃烧的志愿之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万物之新发于硎。育才青年的身影，奔跑着、行动着，在“大爱”“奉献”“求真”“创造”中前行，让“乐群”在行知路上熠熠生辉。我们在重山瓦隙间发光发热，向世界展示青年风采，诠释青春担当。

迎接共青团建团百年，我们虎力全开启新

程，后生可畏更可爱，愿每一位育才青年未来可为更可期。

育才之根，青年之魂，育才青年定将牢记习主席的嘱托，“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 篇章三 我们正青春

“红颜恃容色，青春矜盛年”，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是充满力量的。

在冬奥的赛场上，有许多年轻的身影。18岁的谷爱凌，17岁的苏翊鸣，正向世界展示着年轻人的力量。

在奥运精神的影响下，我们的育才学子也在属于自己的“赛场”上，朝气蓬勃，发光发热。

一则回顾短片，一段澎湃发言，正记录下育才学子在过去的2021年，为青春歌舞，为梦想奋斗的昂扬姿态！



主题演讲《我们向未来》（演讲者：杨琳玥）

我们向未来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高三17班的杨琳玥，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新学期的新感受。

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奥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冰上、雪上跳跃、滑行、冲刺，诠释着何为热爱，何为拼搏，何为奖牌之外、名次之上熠熠生辉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每谈及运动会，我总是会想起史铁生的那句话：“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

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能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俯仰翊鸣迷梦外，纵横冬奥跃青巅。”就在昨天，17岁的苏翊鸣在大跳台再夺一金。谷爱凌、金博洋、任子威……勇者们的故事已无需再赘述。因为热爱，所以拼搏，因为拼搏，所以精彩无限、人生无限。他们以绝对的实力、强大的内心和开放自信的笑容书写着中国新青年最美的模样，平视自己，也平视对手、平视世界。用坦然面对竞争，用热爱兑现承诺。

当我们的心随着运动员们一同起伏，我们对体育偶像的感情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有钦佩、崇敬，更多了一份“想成为”，想成为那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人。

“如果跟着其他所有人，那么你永远都只会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无须复刻运动员们的成长轨迹，却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奔不顾身，奋勇前行。距离高考还有111天。在高考的赛道上，我们的笃定来源于对知识的反复咀嚼，对解题能力的不断训练，勇敢迎接挑战的心态便是枯燥的日常里最鲜活的动力。在人生的赛道上，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勇敢突破界限，不断开拓人生疆域，便是我们对生命的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诠释。

“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样的岸边，我都将以主人的身份上岸。”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奋斗不止，生命不息，正青春的我们，更应以昂扬的姿态，一起奔向未来。

虎年新气象，时代建新功。值此新春佳节，学校美术组教师联合同学手绘出一幅幅育才校园美景，并制作成明信片与台历赠予各位小陶子。祝每一位小陶子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奋发向上，虎年大吉！伴随新年的祝福，歌唱崭新的未来。



青春正当时·一起向未来

作者: 陈嘉祥  
2022.12.15

青春正当时·一起向未来

作者: 陈嘉祥  
2022.12.15

青春正当时·一起向未来

作者: 陈嘉祥  
2022.12.15

## 育才美景明信片

## 尾声 一起向未来

祝愿所有人在新的一年虎气十足、福虎生旺、如虎添翼、虎虎生威，让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里，为梦想奋斗，为青春奔跑，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校领导殷切寄语新学期

# 这个春天，快来看看小陶子的“梦田”里种下了什么？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啊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

猜猜这个春天，小陶子的“梦田”里种下了什么？

草木蔓发，百花吐蕊，处处万物生不息；春山弥望，微风拂面，连年栽树绿满园。

为构建绿色生态环境，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环保意识，近日，重庆育才中学九龙园校区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师生一起种树铺绿，装扮校园。

## 兴续植木 助绿立德

九龙园校区负责人瞿明强校长以植树节为契机倡议：一树留青，万古长青。同一个校园，绿色而美丽的校园环境需要每一位育才学子去守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一片蓝天，文明而美好的祖国未来需要每一位青年学子去开拓。



众人集力，其乐融融



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师生齐心协力

## 手植楸楠 树木立人

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植树现场人声鼎沸，如火如荼；运树环节分工合作，配合默契；运树途中众人集力，其乐融融。

流云湛蓝，春意弥新。春辉灿烂，树影婆娑。撸起袖子，拿起铁锹。一铲一平，压土填苗。

刨坑、扶直、铲土、填平、压实、浇水。各环节有条不紊，在场师生齐心协力，树木树人健体铸魂。

手植春光，树美大地，向下扎根，向上逐光。一棵树，一个愿，种在育才大地，也种在陶子心间。

### 树载希冀 寄情立志

“思悟树”：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忆古今，思当下。吃饭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用水时，一水一滴恒念点滴难求；用纸时，半丝半缕铭记草木难生。



思悟树：学思践悟，知行合一。

“青云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暖风醉人的时光里，以努力的姿态不负春日好韶光，以向上的拼搏换来明日的从容。



青云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博约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博观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积累中，深入浅出，实现真谛。



博约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思辨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身体力行。思辨立树，枝繁叶茂。



思辨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亲爱的小陶子，韶华易逝，俯首是秋，仰首 是春，愿你们在心中也种下梦想，用着这一树的 铺垫，迎接人生春的开篇。

# 热烈祝贺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连续两次获得民盟中央表彰！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热烈祝贺民盟育才中学支部荣获民盟中央“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支部继2021年荣获民盟中央全国“盟务工作先进基层组织”荣誉称号后，第二次获民盟中央表彰。

## 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简介

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成立于1982年，现有盟员51人，高级教师以上职称35人（其中原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副区长1人，正高级研究员、重庆名师1人），学校副校长1人，学校中层管理干部6人。

支部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采取多种形式，扎实开展政治学习、理论研究和民盟优良传统教育，广大盟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盟员们立足本职工作建功立业，彰显风采，在民盟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创新探索和突出贡献，树立了支部良好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020年10月支部换届，民盟区委领导与支部盟员合影

## 多渠道提升盟员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广泛学习宣传盟史与校史。

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挖掘梳理陶行知先生与民盟的渊源，创新地将民盟历史学习与重庆育才中学校史学习有机结合，通过入盟积极分子考察、新盟员培训、支部学习交流等多种途径学习行知生平和育才中学发展历史及学陶师陶成果。

支部邀请支部老盟员、原盟区委主委、原九龙坡区副区长蒋国庆为支部全体盟员开展盟史专题讲座。组织支部盟员系统参观学习陶行知纪念馆。重庆名师、研究员、支部盟员刘元强在重庆市民盟大讲坛活动上作了《民盟发展历程》的盟史宣讲。盟区委副主委、学校副校长、盟员江明华在民盟九龙坡区盟史宣讲、政协履职等多途径大力弘扬主旋律。



“育才民盟与学校发展历史”专题讲座



以陶行知纪念馆为平台，大力弘扬行知文化和红色文化。

支部盟员江明华作为陶行知纪念馆设计建设和展陈规划的项目负责人，巧妙地将陶行知、民盟历史以及多党合作等史实巧妙地置入展陈当中。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组织盟员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场馆资源，作为纪念馆志愿讲解员，开展陶行知先生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社会活动和教育实践宣传推广。



学校陶行知纪念馆被授予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



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到馆参观



九龙坡区领导参观陶行知纪念馆

根植教育主阵地，推进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辐射引领。

民盟重庆育才中学支部盟员均为学校优秀一线教师，盟员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九龙坡区教育“五五行动”，基于学校创新生活教育课程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一是夯实教室生活大课堂，通过教学育人，培养学生学习力。二是开展校园生活大课堂，通过活动育人，培养学生自治力。三是构建家庭生活大课堂，通过家庭育人，培养学生生活力。四是实施社会生活大课堂，通过实践育人，培养学生创造力。

立足届别收集社情民意撰写提案，拓展建言咨政渠道。

支部盟员认真履职，建言献策，通过协商座谈、两会建言、课题调研、社情民意等方式积极反映民声，充分体现了民盟“关注国是，奔走民生”传统和重庆育才中学“教育为公，行知育才”的办学宗旨。

今年年初的两会期间以支部盟员为主体向区政协十一届会议提交的《“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集体提案和大会发言，呼吁基于“双减”政策开展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体化培养，受到了区主要领导批示和区教委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响应。



支部盟员刘刚代表盟区委在九龙坡区政协十一届大会做《“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交流发言

### 践行社会服务宗旨，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和校园文化。

在盟市委和盟区委的指导协调下，民盟九龙坡区委、重庆育才中学与武隆土坎中学帮扶结对，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让更多学生享受公平而又有质量的教育。

盟员江明华多次带队，支部主委、副主委及盟员到土坎中学开展示范课、讲座培训、校园文化建设规划，协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在土坎中学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落地生根。土坎中学现已成为重庆育才中学教育集团联盟校并更名为武隆育才中学，他们也将陶行知教育理念作为该校现在的办学理念。



民盟市委、民盟九龙坡区委、民盟武隆区委领导一行到校交流



武隆区土坎中学校(现武隆区育才中学)帮扶合作座谈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民盟的使命与责任。在教育工作中，支部始终将民盟“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与育才中学“行知育才，教育为公”办学理念相结合，并以之作为盟员教育工作者的指导思想，为推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